

地緣政治下中小國的國家韌性

作品集

指導老師：方天賜教授

輔導老師：何志勇教授

申請人：許懿、江瑜庭、陳品璇、

劉詠婕、朱蕾靜、朱韻璇、

簡嫚萱、劉惟瑩

目次

- Podcast
  - 第一集（朱蕾靜、劉詠婕）
  - 第二集（朱蕾靜、劉詠婕）
  - 第三集（江瑜庭、許懿）
  - 第四集（陳品璇、劉惟瑩）
  - 第五集（陳品璇、劉惟瑩）
  - 第六集（朱韻璇、簡嫚萱）
  - 第七集（朱韻璇、簡嫚萱）
- 投書
  - 中小國如何應對封鎖荷姆茲海峽所帶來的能源衝擊--以馬來西亞為例（許懿）
  - 中美以外台灣外交的第三條路（許懿）
  - 真的有新冷戰嗎？（許懿）
  - 毒品如何影響國際政治？（許懿）
  - 從走訪印度經驗看台灣引進印度移工（江瑜庭）
  - 觀點投書：揭秘俄羅斯當前不為人知經濟與民生！中俄互利共生成為俄戰時最佳盟友？（一）（江瑜庭）
  - 觀點投書：關稅與禁令擋不住的中國電動車洪流，美國注定敗下一城？（江瑜庭）
  - 觀點投書之美伊衝突對印度之影響（江瑜庭）
  - 從宏都拉斯重新思考台灣外交（劉惟瑩）
  - 美國對古巴的制裁：宣揚民主價值背後其實是霸權手段？（劉惟瑩）
  - 印度移工政策回顧台印關係：印太戰略下的新夥伴關係（劉惟瑩）
  - 從美伊衝突看聯合國淪為大國角力舞台（劉惟瑩）

目次

- 戰略真空下的博弈–北韓新浦試射與地緣政治勒索的兩難困境（劉詠婕）
- 看清趁虛而入的戰略邏輯:北韓飛彈試射撕開現實，和平從不是透過強權的施捨（劉詠婕）
- 多米諾骨牌已倒下：歐盟秘密兵推的殘酷現實，與給台灣的終極警鐘（劉詠婕）
- 變局中的矽盾崩解:從「全球化樞紐」到「強權矽鎖」的台灣困境（劉詠婕）
- 清大校園的外籍朋友：從大學生視角看新南向人才交流（陳品璇）
- 高教國際化的缺口：談大學校園中的政治缺席（陳品璇）
- 新冷戰時代：美中俄的大國角力（陳品璇）
- 從《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看台灣民主化的意義（陳品璇）
- 「Z世代整頓政壇」之後：尼泊爾Z世代內閣的治理難題，與台灣的韌性借鏡（朱蕾靜）
- 從人社班退場看「人才荷蘭病」：教育政策應以文理共生重塑國家韌性（朱蕾靜）
- 【書評】拒絕宿命論的小國生存學：從《新加坡大戰略》看台灣的突圍與軟韌性（朱蕾靜）
- 拒絕成為大國棋子：從《真實烏托邦》看台灣「人人外交」的真實防禦力（朱蕾靜）
- 從卡達投資局看地緣政治下的經濟防禦（簡嫚萱）
- 在新冷戰邊緣，中小型國家如何應對？（簡嫚萱）
- 烏俄戰爭後，卡達如何重新定義全球能源版圖？（簡嫚萱）
- 一條海峽如何牽動世界神經？從荷莫茲海峽看全球秩序（簡嫚萱）

目次

- 兩個伊朗：從《茉莉人生》看媒體與現實間的矛盾（朱韻璇）
- WHA敲門十年（朱韻璇）
- 母語、文化與認同（朱韻璇）
- 從南韓選舉爭議反思台灣不在籍投票之立法攻防（朱韻璇）

- **小論文**
  - 台灣民眾在拜登和川普第二任期對美國協防台灣之民意差異（劉惟瑩、陳品璇、朱韻璇、許懿）
  - 經濟資源是能提升小國外交彈性: 卡達在 2017 年卡達危機後的經驗（朱蕾靜、劉詠婕、江瑜庭、簡嫚萱）

podcast錄製

Podcast錄製

本學期 Podcast 共錄製 7 集，每集時長約 10 至 15 分鐘，由各週導讀組員輪流負責錄製。內容以讀書會各週書目的導讀與心得分享為主，並搭配國際時事進行延伸討論。



第一集 （朱蕾靜 & 劉詠婕）

本集 Podcast 上集的焦點在於《新加坡大戰略》這本書，探討地緣政治下中小型國家的國家韌性與生存戰略。在大國博弈越演越烈的時代，台灣常被視為中美對抗的棋子或陷入統獨爭議。然而，本集透過新加坡從「毒蝦」到「豪豬」的戰略轉型，指出小國突圍的關鍵在於「身分脫鉤」。台灣應將政治爭議轉向「功能身分」，例如強調自身作為「全球半導體心臟」的技術領先地位，讓大國基於全球供應鏈利益與台灣形成共生關係，進而化解對手的敵意與外交封殺。

在延伸討論部分，本集探討台灣在聯合國、東協等傳統政治舞台受限下，如何創造集體發聲管道。講者以 AIESEC 的實戰經驗為例，強調青年參與是極具爆發力的非傳統外交突破口。透過跨國交流專案，台灣能在國際間建立長期的「信任網絡」。這種「軟韌性」的國民外交雖無硬性條約約束，卻能為台灣建立強大的社會免疫力與軟實力防護網，讓我們在關鍵時刻不孤軍奮戰。

podcast錄製

第二集 （朱蕾靜 & 劉詠婕）

本集Podcast則延續新加坡的生存戰略，深入探討韌性實踐、領導力與大國博弈。本集強調小國不應陷入傳統外交的「悲情訴求」成為「被動受難者」，而應轉向成為具備「不可替代功能性」的「主動解決者」。例如，台灣不應只強調受威脅，而應強調自己是全球資安與供應鏈的防護者，將世界的依賴轉化為強大的外交籌碼。此外，節目也分析了新加坡領導層的戰略遠見與國民立場的「一致性」，說明其敢於表態的底氣來自於國防硬實力與全球金融中心軟實力的充分準備，實現國防與經濟並行不悖。

在國際時事結合的部分，本集透過兩個實際案例驗證大戰略理論。首先是美國、伊朗與石油博弈的議題，分析新加坡身為全球物流與能源樞紐，如何專注維持貿易暢通，把經濟地位變成國防的護城河。接著，講者分享了新加坡強烈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時事。平時中立的小國之所以為烏克蘭發聲，是因為這牽涉到小國生存的底線；若放任大國隨意侵犯小國，國際法治將蕩然無存。這也為同樣面臨強鄰威脅的台灣帶來了深刻的啟示。

第三集 （江瑜庭 & 許懿）

本集關注的焦點在吳玉山和楊三億主編的《左右逢源還是左右為難：中小型國家在兩強間的抉擇》。在平常討論國際關係的時候，我們都會將目光放在大國上，例如美國和中國，因為它們擁有強大的軍事實力和科技，在國際舞台上有著龐大的話語權，反觀中小型國家無人問津。中小型國家值得討論的理由正好就是受限於它們國家的體量，它們每天在外交上都得做出艱難的選擇。本集討論了抗衡、扈從及避險的外交政策，並且以土庫曼、哈薩克及南韓分析其外交政策和相關的結果。

在國際時事分享的部分，本集首先分享了哈薩克與德國巴伐利亞洲共同簽署能源出口相關的備忘錄，這部分呼應了本集前半部分所提及哈薩克的外交政策。接下來，講者分享了南韓與中國之間針對「智慧財產權保護」所進行的司局級會議。這樣的會議雖然尚未達到元首級交流所帶來的象徵性，但也可見中韓之間務實的外交走向。最後，本集提到北韓與南韓之間關係的轉變。李在明上任總統以後致力修復與北韓的關係，但北韓方面卻給出截然不同且矛盾的回應。

podcast錄製

第四集 (陳品璇&劉惟瑩)

本集 Podcast 以《新冷戰》第一部〈諸國齊心的大夢〉為核心，討論冷戰結束後，美國如何誤判俄羅斯與中國的發展方向。西方曾期待俄羅斯會逐漸融入歐洲，也相信中國加入世界貿易體系後，會因經濟開放而走向更自由的政治制度。然而，俄國後來走向帝國復辟與對烏克蘭的侵略，中國則在經濟崛起後進一步強化威權治理，顯示美國的樂觀想像，最終沒有真正實現。我們也延伸討論中國加入世貿後是否變得更自由，中國的經驗反而證明經濟成長不一定帶來民主化，威權政體也能與市場經濟並存，甚至透過經濟資源、科技監控與數位治理來強化社會控制。習近平更明確強調社會主義制度終將勝利，使美國當初認為「經濟開放會帶來政治自由」的假設背道而馳。

最後，本集也將《新冷戰》的討論連結回台灣處境。我們討論台灣是否也可能出現誤判，例如過度相信某一方一定會支持台灣，或忽略國際政治本質上仍以利益為核心。在供應鏈重組下，台灣一方面可能因半導體與產業轉移提升戰略地位，另一方面也可能因過度依賴單一產業、被捲入中美對抗而承受更高風險。本集最後提醒，世界不是突然走到今天的新冷戰局勢，而是一步步由誤判累積而成，而我們現在也可能正站在下一個誤判的起點。

第五集 (陳品璇&劉惟瑩)

本集介紹到《新冷戰》這本書的第二部，主要聚焦於拜登與川普初期政權轉移前後美國的變化，以及美國、中國與俄羅斯三大強權之間的競爭。首先提到美國發生的幾件關鍵事件，像是美國政府部門遭到俄國SolarWinds駭客攻擊，引發對於數位攻擊的規範與跨國合作，還有1月6號因川普敗選引起國會大廈佔領，後續還有從阿富汗倉促撤軍、中國高超音速武器測試，以及烏俄戰爭爆發等。這些事件均反映出美國面臨內部分裂、新的世界挑戰，同時也必須因應中國崛起與俄羅斯帶來的壓力，強權主導世界的時代也已進入尾聲。

作者認為當前世界正逐漸形成新的國際對抗格局，但與過去美蘇冷戰不同，競爭不再只侷限於軍事領域，它擴展到科技、供應鏈及網路安全等層面，我們也可以藉以理解當今國際局勢確實非常複雜。透過本書可以討論到，書中提及烏俄戰爭誤判時機的問題，指出美國面對俄羅斯採取制裁與對話並行，仍未能阻止戰爭發生。我們將這個狀況套回台灣，如果發生在台海情境，台灣與其盟友應更強化嚇阻，還是建立更多對話機制，以避免誤判升級。本集最後想提醒，面對這樣的情況，我們可以採取兼容的方式，在檯面上要堅定自己的底線，但檯面下也要有持續的對話，但若是對方強勢入侵的情況下，應該採嚇阻強調入侵代價和國家反抗決心。

podcast錄製

第六集 （朱韻璇＆簡嫚萱）

本集Podcast 主要介紹《新冷戰》第三四部分，烏俄戰爭中的高科技與地緣政治。開戰初期，外界普遍預測基輔將在短時間內淪陷，然而烏克蘭展現了極高的抵抗意志。除了勇氣，西方盟友的「科技」與「情報」成為關鍵推手。美方在開戰前便透過「前進獵捕」行動派出網絡特種部隊協助防禦，戰爭爆發後更迅速啟用星鏈，並由矽谷巨頭將核心數據搬遷至雲端，使俄軍的網路封鎖與通信癱瘓戰術失效。西方與矽谷供應商進一步整合衛星、社群照片和無人機畫面，形成名為「大一片玻璃」的系統，能在 18 小時內自動篩選統整海量情資並精準傳送至前線，實現了高度透明的現代化戰場。然而，高科技優勢在 2023 年移至烏克蘭東南部時，面對俄軍由戰壕與地雷組成的「蘇羅維金防線」，AI 與雲端技術難以推進，戰局依然回到了傳統且血腥的消耗戰。同時，美國在提供科技優勢時心態極其矛盾。為了防止衝突擴大為核戰，拜登政府採取「溫水煮青蛙」的控溫策略並設下嚴格紅線，例如禁止分享導致俄軍高層直接死亡的即時定位，甚至對硬體進行限制以確保無法打擊俄羅斯本土。這種手段雖防範了世界大戰，卻也讓這場戰爭演變成漫長的放血消耗戰。

第七集 （朱韻璇＆簡嫚萱）

本集接續探討中東戰火、美中地緣政治對抗，以及其如何牽動台海局勢與全球晶片供應鏈的博弈。中東衝突爆發打亂了美國將資源集中於印太圍堵中國的全球戰略，北京則趁虛在南太平洋與發展中國家展開外交攻勢。面對中國全政府式的滲透，美國祭出小院高牆策略，精準界定核心戰略技術範圍，並實施嚴格出口管制。這面高牆將地緣風險聚焦於生產全球九成最尖端晶片的台灣與台積電。「矽盾理論」雖認為美中兩強因承受不起晶片斷供而不敢輕舉妄動，但美方也深恐台海遭封鎖會切斷軍用晶片來源，因而近年軟硬兼施地引導台積電至美、日、德設廠以分散地緣風險。

內容中也提到了在新冷戰架構下台灣的戰略抉擇與矽盾未來的演變。台灣如何在最尖端製程內積極向美國技術聯盟靠攏以共享安全防線，同時在成熟產業鏈中動態維持商業彈性，降低成為博弈犧牲品的風險。此外，針對海外晶圓廠技術追上、台灣晶片獨特性被稀釋的隱憂，內容則指出「矽盾」必須被重新定義，台灣在國際政治上的不可替代性，需要從單純的「晶片產能製造者」，升級為全球「信賴供應鏈、民防科技與反制認知戰」的亞太防衛核心樞紐，將第一島鏈的地理關鍵與全社會防衛韌性深度結合，向世界證明這座島嶼在科技以外更具備無可替代的民主防禦價值。

投書

許懿-中小國如何應對封鎖荷姆茲海峽所帶來的能源衝擊——以馬來西亞為例

在觀察國際間大事之時，人們都習慣以大國作為焦點去分析觀察。就像最近伊朗局勢的發展，報章媒體的報導都把重點放在川普的行為上。雖然川普的作為確實充滿了話題性，也能夠為報導帶來流量，但被伊朗戰局影響的不單單只有美國一個國家，還有許許多多的中小國同樣受到波及，甚至因著自身國力較弱而被影響的範圍更大。本文將介紹馬來西亞在伊朗戰局爆發以來的一些舉動。雖然有些行為並非與伊朗直接相關，但由於伊朗局勢帶來的影響過大，其行為依然與伊朗局勢掛勾。

伊朗封鎖荷姆茲海峽，導致能源價格飆升，能源市場出現恐慌。這些衝擊對於馬來西亞來說也一樣巨大。雖然馬來西亞自身生產原油，但其產量遠不能滿足國內需求，因此向外尋求進口，而馬來西亞進口的原油有38%通過荷姆茲海峽。另外，大馬政府過往都會針對汽油進行補貼，造成此能源市場的動盪將會大幅增加大馬政府的財政壓力，因此馬來西亞政府相當重視相關發展，同時也積極規劃對應措施。

首先是關於能源穩定性的問題。在 4 月初，政府向公衆說明了馬來西亞目前的能源供應狀況。雖然國際油價因為中東局勢變得極其不穩定，但國內的供應狀控仍算穩定。馬來西亞政府會作出這樣的行為最主要是讓民衆安心，因為這些時候最害怕的就是出現類似擠兌的狀況出現，加劇能源供應的匱乏。另外，如前所述，政府長期的補貼使得其財政壓力不斷擴大，倘若市場出現恐慌，政府也將無法有效管理國家。

與此同時，政府也注意到能源價格對農業產生的連鎖反應。在 4 月 15 日，相關部門宣布加強對稻農的柴油補貼援助。其中的邏輯很簡單，當農業相關業者的生產成本提升的時候，這樣的成本提升就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進一步加劇通貨膨脹，因此政府選擇介入處理。

近日澳洲總理出訪馬來西亞，針對能源議題展開了深入的交流。馬來西亞首相安華提到大馬將會在滿足自身能源的需求以後再供應澳洲相關的需求。從這些事件來看，馬來西亞雖然作為小國，但國際局勢的發展也會重大影響到其國內的局勢，因此馬來西亞政府才如此積極的有所作為。

投書

許懿-中美以外台灣外交的第三條路

川習會結束以後，美國尤其川普對台言論舉世矚目。一句「我不想要看到任何人走向獨立」，各大新聞媒體為之轟動，紛紛預言台灣局勢即將變天。賴總統的回應也一如既往地開始玩起文字遊戲，宣稱「台獨」二字有不同的意涵。對於兩岸多年對峙的政治戲碼，筆者從馬來西亞來台留學以後每日翻開報紙都能夠見到相關標題，早已顯得些許疲累。除了美中台的三角關係，難道台灣就沒有其他的路可走了嗎？這世界上面對中國威脅的國家抑或面對類似威脅的國家不只台灣，筆者於此想提供另一種思考的角度，看看東南亞各國做出了哪些行動。

首先，選擇東南亞的原因是因為東南亞同樣也持續不斷地遭遇中國的威脅，特別是有關南中國海的主權爭議。在外交上，許多位於東南亞國家例如新加坡、馬來西亞都力圖奉行避險政策，避免在美中之間選邊站。這樣的避險政策在中美關係處於敵對的關係下仍能夠持續運行，但川習會以後川普對於中國的誇讚，加上對習近平的讚賞，讓東南亞各國也意識到美國在川普的帶領下步入某種「修正主義」的道路，背離過去奉行民主價值的思想。

在中美雙方都不宜靠攏的條件下，東南亞各國努力地找尋出路。其中一條出路即是東南亞國家協會（東協）。在五月初，東協峰會於菲律賓舉行，其中討論了多個重要的議題，包含對於中東衝突、南中國海領海爭議等議題，並就這些課題發表聯合聲明，展現東南亞各國對於這些課題的團結與一致的表態。除了借助區域組織的力量，各國也尋求中美以外的選擇。舉例來說，越南於近期接待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與南韓總統李在明的訪問。在訪問中，越南方面與日本簽署了能源、稀土相關的協定，也與韓國方面簽署有關核能與科技合作的協定。除了越南，印尼總統普拉伯沃也率團訪問俄羅斯，並簽署協議購買俄羅斯原油。

早前新南向政策走向常態化，筆者覺得些許的惋惜。雖然這並不意味著政府不再推動與東南亞各國的外交關係，但走下舞台，也讓人們更難注意到除了美中以外的選擇。東南亞並不排斥台灣，至少作為馬來西亞人的我身邊的人對於台灣都蠻友好的，但從網路上對於東南亞移工或印度移工的排斥來看，我認為台灣民眾仍不具備充足的國際觀，也仍將台灣的外交環境侷限於中美兩強之間。目前世界格局由中美主導沒錯，但這世界很大。

投書

許懿-真的有新冷戰嗎？

如今的世界真的進入了新冷戰的局面嗎？美中競爭的升溫、科技戰的持續、全球供應鏈的去風險化加上各地大大小小的戰爭都讓人重新思考冷戰是不是回來了。在《紐約時報》專欄作者戴維·桑格的《新冷戰》一書中，當今世界正在形成以美國與中國為核心的新型戰略競爭，美中兩國在人工智慧、半導體、軍事科技與全球影響力等領域的角力，某種程度上類似過去美蘇冷戰時期的對抗。

再仔細思考一下20世紀中後期冷戰的世界格局與今天的國際局勢，其中兩者仍存在較大的差異，而我認為如今錯綜複雜的世界格局並非能夠以簡單新式的「冷戰」來解釋。第一，如今世界尚未形成如同美蘇時代般明確且穩固的兩大對抗集團。第二，意識形態上的分類難以讓世界各國都恰好選一邊站，如同冷戰時期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陣營一樣。

以陣營分別來說，冷戰時期為何研究起來較為容易正是因為其擁有明確的陣營，即美國領導西方的資本主義國家，而蘇聯則領導東歐與其他共產主義國家，形成以北約與華沙公約組織為代表。在這種結構下，各國在安全、經濟與政治制度上都有高度明確的選邊壓力。但如今川普上任以後對待盟友的種種行為，不管是從德國撤軍、撤銷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都可以看出美國似乎並不在乎任何結盟關係。另外，實際去觀察各國的對外關係就可以發現多數國家都是在經濟上依賴中國，安全上依賴美國。

其次，目前的美中競爭並未完全出現意識形態上的對抗。在冷戰時期，美蘇對抗的核心在於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競爭上，而到了如今世界局勢中較難發現如此的趨勢。中國方面確實有在對外關係的發展上輸出中國自己那套的規則，但中國自己內部也在倡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能夠看出中國以自身為優先發展思想。反觀美國也一樣，美國目前也缺乏一套能夠凝聚國際社會的明確理念，就連美國自己內部也難以凝聚了。川普的政治核心在於保護主義，例如貿易保護、關稅戰爭等等，而非當初提倡的自由民主秩序。

因此，美中競爭雖然激烈，但其本質更接近國家利益、科技優勢與地緣政治影響力的競爭，而非兩套政治思想的全面衝突。照這樣的角度去思考，加上種種戰爭事實的理解，大概也能夠看到各大國都難以具備形成集團的號召力，於是也難以發展成冷戰時期的局面。

投書

許懿-毒品如何影響國際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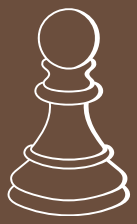
近期台灣毒駕事件頻傳，引發社會對公共安全與毒品防治的高度關注。就我們教育層面來看，社會民眾大多都將毒品視為個人健康或社會治安的問題，但倘若我們更深入了解毒品從何而來，要到哪去，我們即能發現毒品已然成為影響國際政治、國家安全的重要議題。

在現代國際社會中，毒品問題朝向全球化的方向發展。從南美洲的古柯鹼、東南亞金三角地區的毒品生產，到近年快速增長的合成毒品，毒品供應鏈往往跨越多個國家。販毒組織利用全球交通、資金流動與科技發展建立跨國網絡，並透過洗錢、賄賂等方式影響地方政治，使得部分國家的中央管理能力受到挑戰。

當販毒組織掌控地方勢力以後，他們便會掌握當地政治的話語權，進而利用當地的環境進行其製毒、運毒等工作。要看毒品如何影響國際政治，只要考慮到毒品的跨國流動性即可。墨西哥大量的毒品銷售目的地就是美國，美國也多次試圖打擊當地毒梟；另一方面，美國也積極處理中國芬太尼原料流入美國的問題，甚至透過貿易與外交手段施壓。由此可見，毒品問題已經從單純的犯罪議題，延伸成國家間外交談判與利益競爭的一部分。
然而，面對毒品問題，單純依靠嚴刑峻法並不足以解決。過去許多國家採取強硬的「毒品戰爭」策略，但毒品市場仍持續存在，顯示問題背後涉及經濟、社會與公共衛生等多重因素。因此，現代毒品治理逐漸強調雙軌策略：一方面打擊跨國犯罪組織，另一方面協助成癮者接受治療與回歸社會。更重要的是，各國必須透過國際合作，建立資訊共享與聯合執法機制，才能有效應對跨國犯罪網絡。

對於台灣而言，雖然不是主要毒品的生產地，但位於東亞交通樞紐，仍然容易受到國際毒品市場的影響，近期在港口破獲的毒品走私案例就可以窺見其樣態了。近年新興合成毒品增加，使毒品防治不再只是國內警政問題，而需要結合國際合作，包括邊境管理、情報交換與金融監控。台灣除了努力防堵毒品的進入，也必須思考如何提升自身在國際毒品治理中的參與程度。

然而，台灣作為國際政治中的中小型國家，在影響全球毒品供應鏈方面確實存在限制。毒品的生產地、轉運地與消費市場往往分布於不同國家，單一國家的力量難以改變整體結構。因此，台灣除了強化國內防治，更需要透過與其他國家的合作，掌握國際犯罪網絡的變化。從這個角度來看，毒品問題提供了一個觀察國際政治的新視角：它讓我們看見國際關係不只是大國之間的軍事競爭，也包含資金、人口、資訊與非法商品流動所形成的複雜角力。



投書

毒品問題提醒我們，全球化帶來的不只是經濟交流與科技進步，也讓犯罪與安全威脅更加容易跨越國界。台灣面對毒駕事件時，不能只將其視為個人行為失控，而應理解其背後所連結的國際環境。唯有同時從國內治理與國際合作兩個層面思考，才能更全面地面對毒品帶來的挑戰。

投書

江瑜庭–從走訪印度經驗看台灣引進印度移工

近期民進黨所提議引進印度移工的議題吵得沸沸揚揚，大批民眾訪談引發爭議。作為一名在新竹市就讀大學的學生，更能共感台灣人對於移工的刻板印象與擔憂。在台灣人眼裡，印度是一個人人不平等、每小時性侵案件高達51件的國家，充斥著危險、父權、惡意，除此之外也參雜著對於印度多樣的負面刻板印象。但事實真的只有這樣嗎？

今年三月，我隨教授與清大印度中心至印度進行參訪與交流，也進行派遣華師至印度的策協商談判。在這過程中，我不乏有許多機會與當地簽約學校學生交流聊天的機會，令人驚訝的是我總共與八位學生交談中，每一位學生都表達了他們有到台灣就學的意願，也讓我憶起在我就讀的清華大學中就有132名印度籍學生擁有在學學籍。實際走訪印度讓我看到印度人聰明、熱情、誠以待人的一面，我也深刻意識到印度不是只有髒亂和危險。

台灣自詡是一個包容多元的民主社會，但在看到網路上民眾反彈中激進、充滿歧視又違反現實客觀的言論，實在倍感諷刺與遺憾。同時，我們也忽略了印度移工其實並沒有設定特定性別，若是以性別及性自主議題為擔憂，那政府應該思考是否能以女性移工作為主要引進對象，並且增加印度移工申請門檻與人事培訓。再怎麼說，都不該放任民眾對於印度移工議題有無限上綱的批評與歧視。

將心比心，台灣人對於在國外被歧視和言語攻擊的處境也會讓國人感到非常的憤怒與不平。我認為，政府目前該做的除了暫緩政策的推進外，更重要的是對於印度國情的澄清，以保障在台之印度籍學生與工作者免於歧視及權益迫害。否則，在台灣的印度人對台灣又有什麼樣的看法呢？

印度作為全世界最多人口的國家，未來之產業及國際競爭力不言而喻，台灣方為促進台印關係而簽定的合作備忘錄，現在卻反而讓惡意與歧視肆意蔓延，實屬達到反效果。



刊登於2026-05-08

投書

江瑜庭–揭秘俄羅斯當前不為人知經濟與民生！中俄互利共生成為俄戰時最佳盟友？（I）

俄羅斯作為世界大國，因戰爭受到國際經濟制裁是怎麼維持民生的？除了檯面上的解方，是否也有不為人知的黑暗面？筆者於2026年初赴俄羅斯有了關鍵發現。在俄羅斯海參崴（Vladivostok）貨幣交易所中，當地人民幣官方匯率與中國境內官方銀行匯率之間，居然存在超過30%的匯差。也就是在中國境內100元人民幣兌830盧布，進到俄羅斯境內居然可以兌1100盧布。更扯的是，俄羅斯出現大量的中文包裝的可口可樂與其他美商民生用品，並且價格比定價高出好幾倍。

這種事情基本上沒辦法存在於國際社會，然而，2022年烏俄戰爭爆發後，以美國為首之發達經濟體做為霸權，對俄羅斯實施全方位金融制裁。當俄羅斯被切斷進入SWIFT等全球金融公共財的管道後，其境內之經濟社會和金融體系相對封閉孤立且定價失真。

俄羅斯本土經濟被迫進行由西向東轉向，而中國則成為其最重要的戰略夥伴。俄羅斯為防範制裁，已積極將依賴的外部金融工具本土化與去西方化，包含增加黃金儲備並增持人民幣資產以替代美元。

然而，由於俄羅斯主要金融機構受制於制裁，正規的人民幣結算管道畏懼二級制裁，導致俄羅斯境內人民幣供給出現極度扭曲。所以，人民幣提供了戰時經濟的避風港與新多邊金融合作之制度保障，但是地緣政治壓力導致的清算成本與匯率溢價，卻轉為俄羅斯本土企業必須承擔。

有數據指出，人民幣清算的增加在受制裁的軍民兩用產品與工業產能產品貿易中最為明顯。這也是為什麼美商產品為什麼可以在美國撤出俄羅斯市場後，仍得以透過中國轉口路徑重新輸入，且因爲規避制裁之物流難度與清算風險，也導致一般通路之零售價格比原價貴好幾倍，一瓶鋁罐可樂售價約100台幣左右。

從這個視角可以發現，在烏俄戰爭後，中國其實透過一些秩序外的行動重塑了俄羅斯的金融市場，並在歐美霸權撤出資本後重新建立了新的替代供給體系。

投書

江瑜庭–關稅與禁令擋不住的中國電動車洪流，美國注定敗下一城？

近期，一台頂級配置的中國電動車僅要價三萬美金的新聞，吸引越來越多人的目光。根據研究機構Strategic Vision愛德華茲（Alexander Edwards）對美國新車買家的年度調查，2026年有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會考慮購買中國製造的汽車，而這一比例在2021年僅為18%。美國發布的車輛限用中國軟體禁令與高關稅，是否還能牽制中國？

中國電動車崛起席捲全球，其實還有更深層的結構性因素。筆者於去年至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就中美電動車產業之競爭為題進行學術研究。當時核心提問是：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在電動車產業，中國在短短十餘年間超越美國，並取得主導優勢？而美國在具備先發條件下，為何逐漸陷入劣勢？

筆者發現，對於電動車產業的補貼方式差異是首要造成普及率和市場規模差距的因素。從2009年起，中國開始了「購車補貼」與「十城千輛」計畫。這是一個結合補貼和政策的雙面推動，選定10座城市作為第一批示範城市並推廣至少1000輛新能源車，包括公共交通、出租車、公務車和郵政車輛。而中國的中央政府提供財政補貼，地方政府再配套獎勵，例如購車補助、免稅、免費牌照等等。

這看似單純是金錢方式的補助，實則中國人民看上的是那就是「免費牌照」政策。在中國的一些大城市中，因為交通和人流量管制的因素，開始實施車輛限購政策和抽車牌以改善城市的問題。而因為電動車不用參加「搖號」即可取得牌照，做為鼓勵措施，也讓電動車在中國一線城市的普及率快速升高。

筆者認為相較之下，美國在新能源車補貼上的力度與連續性明顯不足。自2008年起，美國聯邦政府提供最高 7,500美元的購車稅收抵免，但僅限前20萬輛銷售的電動車企業可以享有。而這樣的政策導致特斯拉和通用汽車等早期進入市場的企業很快便用盡配額，後期才開始發展的汽車企業反而享有政策紅利，削弱了補貼的公平性與長期誘因。

而另外十分重要的是，中國掌握了全球七成以上的電池產能，其中寧德時代與比亞迪合計市佔率超過 50%。中國企業更透過「走出去」戰略，已在非洲、南美等地投資鋰礦與鎳礦以確保原料供應。也因如此，中國企業不僅在電池製造上居於優勢，更能掌控上游資源，形成完整的產業鏈閉環；相較之下，美國在電池領域嚴重依賴進口，即使拜登執政時在《通膨削減法案》的激勵下美國正積極建設本土電池工廠，但短期內難以改變產能集中於亞洲局勢，這也使得美國電動車企業在成本與供應鏈穩定性上處於明顯劣勢。

第二個關鍵原因，美國是一個總統制與聯邦制並行的國家，總統選舉周期為四年，且總統不需對國會直接負責。這一制度特徵使能源與產業政策容易受到政黨輪替的影響，缺乏長期一致性。以電動車為例，歐巴馬政府推動《清潔能源法案》，大力補助新能源車。川普政府則偏向支持化石燃料，撤銷燃油車排放限制，並削弱新能源支持。拜登政府上任後，又以《通膨削減法案》為核心，重新給予新能源車稅收減免與基礎設施投資。短短十餘年間，美國新能源政策經歷三次劇烈轉折，讓企業對政策走向不確定的情況，也就較難去帶動整體產業的發展。

筆者認為，美國方面必須克服政策不連續的問題以突破目前的困境。對於國家安全、民生以及永續製造業等等的議題與國策，是需要在國內有更高的共識和共同發展方向。若民主、共和兩黨無法在能源轉型上達成基本共識，電動車產業發展也將持續受制於政治分裂。美國在自動駕駛、車載軟體與高端晶片設計領域其實仍佔據技術前沿，若能與新能源車結合，將成為新的競爭突破口，不以大型內需市場而是以創新技術成為競爭力的關鍵。

另外，因為美國各州的法律和政策擁有很大程度的彈性與自由，若各州透過當地政策支持，或許能有扶持電動車產業新星的機會。美國目前最大的挑戰在於如何將其高科技優勢與新能源產業做出高 度結合，並投入更大量的政策補助，再透過國際合作彌補產業鏈和市場需求的短板。

最後，筆者認為新能源電動車產業的未來發展不僅是產業競爭，更對於國際能源安全與地緣政治格局造成重大影響。而國際關係和地緣政治的局勢瞬息萬變，電動車產業未來的趨勢走向是全球都十分關注的議題。

投書

江瑜庭–美伊衝突下，美國與印度的外交關係—在能源危機中展現的外交自主

近期因美伊衝突，最為南方世界大國的印度造成了非常大的衝擊。而印度一直以來所採的不結盟外交政策，與各國都抱持以議題為基礎的夥伴關係，在這場戰爭下也進一步影響了美國、中東地區與印度的關係。

面對美伊衝突，印度政府採取了「不選邊、不升級、國家利益優先」的明確表態。在2020年2月28日衝突爆發當天，印度外交部即發布聲明，對西亞局勢表達深切關切，且並未公開支持美國或伊朗任何一方。印度此立場的背後，是印度對將近一千萬名居住於波斯灣國家的印度公民安全之考量，以及伊朗境內亦有印度留學生與工作者的現實。為此，總理莫迪不僅與其他波斯灣國家領導人保持聯繫，外交部長蘇傑生也分別於2月28日與3月5日與伊朗外長通話溝通。

儘管在外交上力求平衡，衝突仍對印度造成嚴重的經濟與能源衝擊。印度高達85%以上的原油需求依賴進口，衝突引發的荷姆茲海峽風險與航運成本上升，直接導致國內燃料價格暴漲。在五月底，印度汽油價格兩度調升至每公升109.70盧比，柴油上漲至96.07盧比。控制全印九成加油站的三家國營企業，在調漲前面臨每月合計近3000億盧比的鉅額虧損。 此外，國際油價飆升推高了印度的進口帳單，惡化了經常帳赤字，導致盧比匯率暴跌。為緩解危機，印度採取「穩外匯、找替代」策略。包含央行介入外匯市場、設立石油公司專門換匯機制；國內則推動德里政府員工每週居家辦公兩天、暫停大型活動以節約能源，並積極尋求俄羅斯原油作為替代來源。

俄油豁免與持續推進的美印關係 印度大量購買俄油的舉動一度考驗美印默契，但美國亦面臨既想維持對俄制裁、又恐懼美伊衝突進一步推高全球油價的兩難。最終，為了避免印度民營企業因國際清算與合規風險而縮手，美國財政部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自2026年3月起，連續發布多個一般許可證，為印度購買俄羅斯石油提供專屬豁免，並一路將授權展延至2026年6月17日。

總結而言，印度在美伊衝突中並沒有特別立場，而是透過多方接觸展現其外交自主的原則。即使面臨通膨與匯率的雙重壓力，印度依然憑藉靈活的政策操作，在保障自身能源與經濟穩定之際，維持並推進了與美國的戰略夥伴關係。

投書

劉惟瑩–從宏都拉斯重新思考台灣外交

2023 年，宏都拉斯宣布與台灣斷交，轉而與中國建交。消息一出，台灣社會出現不少震驚與失落的情緒。畢竟，宏都拉斯與台灣維持超過 80 年邦誼，如今突然轉向。不過，宏都拉斯與台斷交的選擇，背後其實反映許多中小型國家在國際政治中的共同困境，正如當經濟壓力與發展需求迫在眉睫時，國家會優先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方向。

根據遠景基金會的研究，宏都拉斯近年長期面臨高額外債與財政壓力，2022 年外債甚至高達約 200 億美元。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所提供的大型基礎建設、融資貸款與市場承諾，對宏國政府而言自然具有相當大的吸引力。這顯示出台灣與中國在外交競爭上的現實差距，中國能提供的大規模資金與經濟誘因，並不是台灣可以輕易跟上的。因此，如果台灣仍把外交建立在誰能給更多資源的競爭上，幾乎無法取得優勢。值得注意的是，宏都拉斯與中國建交後，情況並沒有如外界原先想像得那麼順利。根據中央社與多家媒體報導，宏國原本期待中國市場能大量收購白蝦產品，取代過去台灣的需求。然而實際上，中國市場不但沒有完全履行採購期待，價格競爭也相當激烈，導致宏都拉斯蝦業受到嚴重衝擊。

過去台灣一直是宏都拉斯白蝦的重要出口市場，甚至願意以較高價格收購。但斷交後，對台出口快速萎縮，中國市場卻沒有補上缺口。根據宏都拉斯水產養殖協會統計，這段期間至少有數十家蝦場倒閉，數萬個工作機會流失，與多業者都認為「被騙了」。前幾日，宏都拉斯終於找到新的出口，即是墨西哥，讓白蝦產業暫時獲得喘息空間。這件事也呈現出當一個國家過度依賴單一大國市場時，會承擔非常高的風險。

2023 年，宏都拉斯宣布與台灣斷交，轉而與中國建交。消息一出，台灣社會出現不少震驚與失落的情緒。畢竟，宏都拉斯與台灣維持超過 80 年邦誼，如今突然轉向。不過，宏都拉斯與台斷交的選擇，背後其實反映許多中小型國家在國際政治中的共同困境，正如當經濟壓力與發展需求迫在眉睫時，國家會優先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方向。
(下頁接續)

投書

過去時間，台灣似乎習慣用邦交國數量來衡量外交成績，但在中國龐大的經濟規模面前，台灣若只想透過金援競爭來維持邦交，將容易陷入被動。相較之下，我認為台灣真正有優勢的地方，反而是深入社會的多面向合作模式。在外交方面，台灣長期在邦交國的醫療、公衛、農業技術與中小企業輔導等領域投入許多資源。這些計畫雖然不像大型建設那樣容易成為新聞焦點，但它們往往能真正進入地方社會，建立長期信任，更容易讓當地民眾實際感受到幫助，提升台灣影響力。而近年台灣即使在部分國家沒有正式邦交，依然能透過科技合作、供應鏈連結以及民主價值交流維持密切互動，也證明了實質關係的重要性，並未必一定要建立在正式邦交之上。

近期宏都拉斯新任總統阿斯夫拉（Nasry Asfura）已開始重新檢視前政府與中國簽署的部分合作協議，外界也不斷猜測宏都拉斯欲與台灣復交之意願。不過我認為從台灣角度來看，比起聚焦在會不會復交，更重要的問題是即使沒有正式外交關係，台灣能不能依然在當地保有影響力？

承如上述所言，台灣即便在沒有邦交關係下仍然能發揮影響力，且較不受政治與國際壓力影響，提升台灣在他國的地位與不可或缺的價值。也許台灣無法和中國比資金規模，但我們仍然可以透過技術合作、民主治理經驗、醫療能力與教育交流，持續在國際社會留下實質影響力。當中國能用更龐大的經濟資源改變外交版圖時，台灣或許更需要思考，自己真正不可取代的價值是什麼。

投書

劉惟瑩–美國對古巴的制裁：宣揚民主價值背後其實是霸權手段？

近期美國政府再次加大對古巴的施壓力道，針對古巴國營能源企業實施新一輪制裁，從先前評估軍事行動、強化情報系統到追究古巴前領導人的法律責任等。面對日益升高的緊張局勢，美國政府強調目的是促進古巴民主化與改善人權狀況，不過從歷史脈絡和地緣政治角度來看，這場衝突背後除了是美國守護民主價值外，更多的是美國對西半球主導權的維護，這是否霸權治理的延續，則令人值得深思。

從美國的角度而言，制裁其實並非毫無正當性。自**1959**年古巴革命以來，古巴長期維持一黨執政體制，在政治競爭、新聞自由與公民權利方面經常受到國際社會批評。過去美國政府均表示，透過經濟壓力和外交孤立可以迫使古巴政府推動改革，從而影響改善人民的自由及基本權。因此，當前對能源產業的制裁、對古巴高層的追究以及各項施壓措施，都被美方視為促進民主轉型的必要手段。支持者也認為，如果國際社會對威權政權採取放任態度將削弱民主價值的普世性，人權侵害會持續存在。

不過，這些制裁是否真的達到了預期效果。過去數十年來美國對古巴實施長期禁運與經濟制裁，但古巴政權並未因此瓦解也沒有出現顯著的民主化進程，政權未消失的情況下受到衝擊最大的即是一般民衆。近年來古巴已面臨能源短缺、通貨膨脹和設施老化等問題，而新的能源制裁進一步加劇了燃料不足與停電危機，人民生活品質持續下降，在這種情況下制裁雖然對政府形成壓力，但直接承受代價的是無數人民。

當國家間的行動以促進民主為名，制裁最終無法推動改革，反而加深社會痛苦，其效果與目的之間便產生了明顯落差，那麼這樣的民主價值豈是降低正當性，經濟制裁和能源政策已經成為霸權國家的外交手段，可能無法真正有效促進威權體制改革。

（下頁接續）

另一個層面來看，美國對古巴採取的行動有地緣政治考量，古巴位於加勒比海戰略要衝，距離美國佛羅里達州僅約一百五十公里。從十九世紀的門羅主義到冷戰時期的古巴飛彈危機，美國始終將加勒比海地區視為自身安全的重要防線。對美國而言，任何可能威脅其本土安全或削弱區域影響力的勢力進入古巴，都是高度敏感的問題。近年來隨著俄羅斯與中國積極擴展在拉丁美洲的影響力，古巴再度成為大國競爭的一環，美國自然擔憂其可能成為崛起中的強權在西半球的重要據點。得此可以看出美方維護國家安全與區域主導地位的戰略需求，捍衛民主價值背後是為維護霸權。

近期美國祭出最新的制裁政策更凸顯了該情況如果經濟制裁已造成嚴重人民衝擊，後續軍事手段又可能帶來更大規模的傷亡與區域動盪，當然過程仍涉及其他政治、族群問題，但採取武力介入是否合理，將是國際社會應關注的問題。美國對古巴的制裁雖然包含民主與人權的價值訴求，但顯現出更多是維護地緣政治利益，在維護民主社會同時，也需避免留下長期的社會創傷，美方在面對古巴問題時，任何涉及武力的選項都必須格外審慎。未來如何在追求民主改革的同時，避免讓無辜人民成為大國競爭下的犧牲者也將是動盪的世界下各國需共同面對的，否則人民將為政治對抗付出沉重的代價。

投書

劉惟瑩–印度移工政策回顧台印關係：印太戰略下的新夥伴關係

2024年，台灣與印度正式簽署勞務合作備忘錄（**MOU**），預計初步引進**1000**位印度籍移工，台印關係進入新的階段。**2026**年**4**月的今天政策公布後，網路上出現大量反對聲浪，其中包括對性犯罪、印度文化衝突及政府勞動環境之疑慮，甚至有大量民眾湧入發起連署反對印度移工來台。政府表示，初期將以小規模方式引進印度移工，並要求申請者具備無犯罪紀錄等條件，希望降低社會疑慮。大眾對於社會治安的不安政府勢必需解決，但從**2024**年起此政策其實即引來民眾抗議聲浪，至今**2026**年許多人對印度的印象，仍停留在媒體所呈現的貧窮、衛生問題與治安疑慮，這樣的反應，其實反映兩年後台灣社會對印度依舊存在相當深的陌生與刻板印象。因此，台灣社會面臨的窘境，不只是是否接受印度移工，而是民眾究竟如何看待印度。

從國際政治層面視角來看，印度的重要性其實早已超越勞務合作本身。印度除了擁有龐大人口與市場外，其戰略地位位於印度洋核心區域，是少數能在區域安全上與中國抗衡的大國之一。近年來，美中競爭持續升溫，全球供應鏈開始出現去風險化趨勢，像是美國推動的印太戰略與**QUAD**（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都凸顯印度在區域秩序中的角色正在提升，希望降低對中國市場的高度依賴。在這樣的背景下，印度逐漸成為國際社會眼中的重要替代市場與戰略夥伴。近年來，印度積極發展半導體產業，目前台灣成熟製程公司如力積電和鴻海等，與印度龍頭財閥的指標性合資案，正將印度推向晶片自主的前線。顯示出台印科技合作已逐漸從政策交流走向實際投資。

過去台灣社會對印度的印象，多半以基礎建設不足或生活條件差異來簡化整體社會樣貌。然而，當今隨著印度逐漸成為全球人口與市場規模皆居前段的新興經濟體，其產業結構與科技實力也正在快速轉型，尤其在資訊工程、軟體開發與高階人才供應上，已具備不可忽視的全球競爭力。當台印開始在半導體等高科技領域展開實質合作時，其實也意味著台灣在合作面中，將從過去把印度視為勞動力與市場來源的角色，逐步轉化為科技與地緣政治地位極速上升的大國角色，台灣如何與這樣的印度建立長期互動關係，也將成為未來印太局勢中相當關鍵的一環。

（下頁接續）

整體而言，如今印度的重要性早已延伸到供應鏈安全、印太戰略與民主合作等更高層次的議題。尤其在美中競爭持續升溫下，台灣若希望降低風險並提升國際空間，就須建立更多元的合作網絡，而印度正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

回到引進移工的爭議，背後其實反映出台灣正在面對一個更大的問題，當國際局勢快速改變時，台灣是否能以更開放與國際化的角度理解世界。全球化下並非僅是過去認知的商品與勞動力流動，背後必然包含文化與價值觀的交流，還有隨其而來的衝突。未來若希望深化與印度合作，台灣社會需要學習的，將是如何以更理性的方式看待台印差異。政府制定之政策即不能只停留在政府或企業層面的佈局，在政策延議現況下，應先讓台灣民眾真正理解彼此文化，才能建立長期穩定的信任基礎。

投書

劉惟瑩–從美伊衝突看聯合國淪為大國角力舞台

2026年2月底美國與伊朗衝突再度升溫，伊朗限制荷莫茲海峽航運後，全球能源供應與國際油價受到劇烈影響。作為全球最重要的石油運輸航道之一，荷莫茲海峽一旦發生危機，不只中東地區，全球經濟都會受到牽連。因此，聯合國安理會針對「保護荷莫茲海峽商航安全」議案進行討論，希望避免局勢持續惡化。然而，根據媒體報導可知安理會於4月將原本涉及授權動武與強制執行的內容，因中國與俄羅斯反對而被大幅刪減，最終僅保留不具法律約束力的防禦性措施。這也讓外界再次質疑，當國際衝突真正爆發時，聯合國究竟還有沒有能力維持世界秩序？抑或早已剩下大國彼此表態的檯面。

聯合國在二戰後成立，其核心理念是希望透過國際合作避免戰爭再次發生，並建立一套能維持和平的全球秩序。在過去，許多人也確實將聯合國視為某種世界警察的角色，認為它有能力透過制裁、決議與國際壓力阻止衝突擴大。但實際上，聯合國並不像想像中那麼有權力。尤其安理會中的五個常任理事國（美國、中國、俄羅斯、英國與法國）都擁有否決權，只要其中一國反對，許多決議就無法真正執行。這也代表，當衝突牽涉到大國利益時，聯合國往往很難做出有效行動。

這次美伊危機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如中央社報導指出中國明確反對授權動武，並強調應透過停火與外交方式處理問題。從表面上看，中國是主張和平，但另一方面，中國本身也是經由荷莫茲海峽運輸石油的重要國家（根據路透社數據分析），因此其立場背後恰有有能源安全與經濟利益考量。美國本身則以「維護航運自由」與「區域安全」為理由持續對伊朗施壓，但其過去背後在中東長期的軍事介入，也經常被批評加劇區域對立。因此乍看之下安理會國家都在談論和平，但真正影響決策的，往往還是大國自身利益。

（下頁接續）

投書

當今許多大型國際組織其實都面臨類似問題，表面上各國透過聯合國開會、協商與提出決議，但實際上，更多時候像是在進行大國間的外交表態與政治角力。當聯合國的決議會因大國利益而不斷被妥協與弱化時，代表著現今國際秩序其實仍然高度受到強權政治主導。無論是近年的烏俄戰爭、以巴衝突，到現在的美伊危機，都能看見聯合國在面對強權衝突時的無力感。當衝突其中一方本身就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或與常任理事國存在高度利益關係時，聯合國就很難真正做到公平介入。這其實也反映出國際政治中的現實主義概念。在現實主義觀點下，國家最重視的永遠是自身利益與安全，因此即使有國際法與國際組織存在，也很難真正凌駕於強權之上。

聯合國現在更像是一個讓各國有地方可以談話、表達立場的空間，以維持外交管道、降低雙方誤判風險並阻止大國間衝突直接升溫，但不是能真正阻止戰爭的嚇阻管道，尤其當涉及大國利益時，其約束能力其實相當有限。對台灣而言，本身就處於地緣政治高度敏感的位置，與集權國家為鄰也位於民主戰略地位要帶，這樣的國際局勢下，無論是美中競爭、台海問題還是區域安全，都與國際強權互動有高度關聯。很多人會認為，只要有國際社會支持，台灣就一定能獲得安全保障。但從聯合國在各種國際衝突中的表現來看，我們不能過度理想化國際組織的作用，當真正涉及大國利益時，各國將可能摒棄價值理念，最優先考慮的即是自身國家的戰略利益。在地緣政治高度動盪的世界下，我們應該更清楚理解國際政治的運作方式，台灣除了持續深化國際合作，更重要的或許是提升自身韌性，包括國防、科技與能源等，在現實的國際體系中，身為小國的我們才有機會掌握自己的命運。而在強權競爭越來越激烈的時代，真正能維持和平的，到底是制度、利益，還是國家之間對衝突代價的共同認知，則值得大家重新審視思考。

投書

劉詠婕–戰略真空下的博弈–北韓新浦試射與地緣政治勒索的兩難困境

今日(4 月 19 日)凌晨，北韓再次朝自東岸城市新浦一帶朝東部海域發射數枚飛彈，這不僅是本月的第四次、今年第七次的試射飛彈，也是經過縝密計算的軍事行動。當國際社會的目光聚焦於伊朗局勢、荷姆茲海峽封鎖與全球油價波動之際，平壤當局選擇此時間點，絕非只是例行公事，而是一場精準切入區域權力真空的「戰略突襲」。

對權力真空的趁虛而入

當前美國正深陷美伊衝突，當白宮的注意力高度集中於伊朗，美軍航母戰鬥群亦被高度牽制於荷姆茲海峽之時。北韓於此時試射，正是看準了美國難以同時應對東亞與中東等危機的困境。所以，北韓透過此次的試射，不僅在測試美日韓三方防禦體系在面對「多頭燒」戰略危機時的反應能力與韌性，亦在向國際傳達，東亞局勢主導權不再由華府主導，平壤掌握了隨時啟戰場與干擾大國議程的主控權。

軍事技術展示背後的談判籌碼

新浦作為北韓的研發潛艦與潛射彈道飛彈(SLBM)的核心基地，此次試射可能涉及了更隱蔽且更具威懾力的水下發射技術。結合先前 4 月 9 日所驗證的「集束彈頭」技術，那北韓便正在建構可突破現有飛彈防禦網的軍事力量。對北韓說唯有展現足以威脅大國的軍事技術，才是在未說與大國談判的強力籌碼之一。

以戰爭風險為代價進行政治勒索

北韓已正式將南韓定位為「最敵對的國家」，徹底拋棄了過往的和談基調，取而代之的是高度的軍事壓制策略。而當北韓將南韓視為可動用核武說毀滅的政權時，半島局勢變陷入了「準戰爭狀態」。今日的試射就像是一場藉機發難的籌碼。在下個月的大國高層會晤在即，今日凌晨進行的飛彈試射，像是北韓正在以戰爭風險說綑綁核地位，強迫將其「核地位確認」與「制裁解除」列入議程–是要「拒絕承認北韓核地位」而走向全面衝突，還是為了避開戰爭的風險而被迫承認其核地位身分。北韓利用國際社會對衝突的避免心理進行施壓，產生動搖與妥協的空間。

(下頁接續)

投書

對台灣的警示–和平不應寄託於強權的注意力

對台灣而言，北韓舉動也是個嚴正的警訊。威權國家往往會鎖定部分區域權力出現真空帶或大國注意力分散的時機點說發難。台灣不能將此事件僅僅視為單純的區域新聞說看待，而是看清這場「趁虛而入」的戰略邏輯。在國際局勢大變動的當下，唯有維持高度的情報共享與強化自主防禦能力，才能在多變的局勢中守住自身的和平。

投書

劉詠婕–看清趁虛而入的戰略邏輯:北韓飛彈試射撕開現實，和平從不是透過強權的施捨(前文加深版)

4月**19**日凌晨，北韓再次自東岸城市新浦一帶朝東部海域發射數枚飛彈，這不僅是四月的第四次、今年第七次的試射飛彈，也是經過縝密計算的軍事行動。當國際社會的目光聚焦於伊朗局勢、荷姆茲海峽封鎖與全球油價波動之際，平壤當局選擇此時間點，絕非只是例行公事，而是一場精準切入區域權力真空的「戰略突襲」。

對權力真空的趁虛而入

當前美國正深陷美伊衝突，當白宮的注意力高度集中於伊朗，美軍航母戰鬥群亦被高度牽制於荷姆茲海峽之時。北韓於此時試射，正是看準了美國難以同時應對東亞與中東等危機的困境。在安全防禦上，美國此時無力對北韓拉動軍事打擊，所以，北韓此時推進武器試驗，美國除了口頭譴責外，根本無暇採取實質上的制裁與軍事反制。而對於北韓，此時不須再看美國臉色，而是利用這空檔測試新型武器系統，加速補足自身武器與不對稱作戰。

此外，北韓透過此次的試射，不僅在測試美日韓三方防禦體系在面對「多頭燒」戰略危機時的反應能力與韌性，亦在向國際傳達，東亞局勢主導權不再由華府主導，平壤掌握了隨時重啟戰場與干擾大國議程的主控權。

軍事技術展示背後的談判籌碼

北韓官媒於4月20日證實，試射配備集束彈彈頭「火星炮-11丁」型飛彈。結合先前4月9日所驗證的「集束彈頭」技術，那北韓便正在建構可突破現有飛彈防禦網的軍事力量。過去所展示的洲際導彈(ICBM)，是用以威脅美國本土但不會輕易動用的戰略武器。而「火星炮-11丁」為超大型火箭炮(短程彈道飛彈)，再配上集束彈頭後，便可成為針對南韓核心基地
的有效武器。集束彈頭在空中解體後，會釋放出數百枚子炸彈，可進行大範圍內的毀滅性打擊，若將其攻擊南韓機場與防空陣地，那南韓所擁有的F-35A隱形戰機基地(清州基地)、薩德(THAAD)、愛國者防空飛彈陣地將無法有效進行反擊，癱瘓南韓的空中反擊與防禦能力，尤其是愛國者防空飛彈與薩德系統面對單一飛彈有極高的攔截率，但面對子母彈雨便難以發揮。

(接續下頁**)**

投書

面對美韓的數十億美元防禦投資，北韓透過展示相對低廉、能量產的集束彈頭飛彈，不僅向外界表明能過透過低成本不對稱武器反制美韓，還可透過製造防禦焦慮，提高在未來的潛在談判中的實質籌碼，成為北韓要求美韓放寬經濟制裁、停止聯合軍演、承認核地位國家等的本金。另外，展示能癱瘓機場與防空陣地的技術，亦是在向美國施壓，使其相信一旦半島開戰，美軍駐韓基地與南韓核心資產將遭受重創。從而讓美國內部對「為南韓協防」政治意願受到動搖。

以戰爭風險為代價進行政治勒索

北韓之前以修憲將兩國關係徹底切斷，並正式將南韓定位為「最敵對的國家」，這一體制上的改變，宣告北韓徹底拋棄了過往的和談基調，取而代之的是高度的軍事壓制策略。而當北韓將南韓視為可動用核武來毀滅的政權時，半島局勢變陷入了「準戰爭狀態」，而試射就像是一場藉機發難以獲取政治利益籌碼。

當時在下個月的川習會在即，進行飛彈試射像是北韓正在以戰爭風險來綑綁核地位，強迫將其「核地位確認」與「制裁解除」列入議程-是要「拒絕承認北韓核地位」而走向全面衝突，還是為了避開戰爭的風險而被迫承認其核地位身分。北韓利用國際社會對衝突的避免心理進行施壓，產生動搖與妥協的空間。

不過在川習會結束後，北韓這次的政治勒索可謂是「既是失敗，亦是成功」。勒索失敗的部分是大國根本沒將北韓列入核心議程，這次談的主要是互降關稅、波音飛機大單、對台軍售等，對北韓採取了冷處理，國際社會目前對衝突的避免心理，轉為了「北韓若不跨越紅線，變裝作沒看見」的冷漠，而北韓所期待的「制裁解除」並未搬上議程。但是本次成功的點在於北韓用最低代價換取到了「時間與默許」，根據美國在**2026**年度的全球威脅評估報告中，刪去了過去幾年都有的「美國不願接受北韓為擁核國」的強硬措辭，這意味著美國實質上已開始對北韓的核地位產生了動搖與妥協。

伊朗與北韓的差別在「正在跨越紅線」與「以跨越紅線」，北韓已進行過數次核試爆，再加上峰會過後中方重申維持半島穩定的立場，可謂是安全保護傘，所以現在要北韓完全棄核已是天方夜譚，所以在戰略上從「防堵」轉為了「不擴散」。但伊朗現在雖有高純度濃縮鈾，但尚未進行核試爆，也未有真正組裝在飛彈上的核彈頭，所以對伊朗目前是進行「全面封殺核武」的措施。此外，伊朗是中東反美、反以勢力**(**例如**:**哈瑪斯、真主黨、葉門胡賽武裝**)**的幕後總管，若美國對伊朗的核議題稍微鬆口，整個中東乃至世界便會陷入毀滅性世界大戰風險；北韓雖威脅日韓，但其主要目的為政權生存與勒索，不至於將核技術源源不絕的主動給多個區域恐怖組織去發動全面戰爭。

(接續下頁**)**

投書

對台灣的警示–和平不應寄託於強權的注意力

對台灣而言，北韓舉動也是個嚴正的警訊。威權國家往往會鎖定部分區域權力出現真空帶或大國注意力分散的時機點來發難。台灣不能將此事件僅僅視為單純的區域新聞來看待，而是看清這場「趁虛而入」的戰略邏輯。在國際局勢大變動的當下，唯有維持高度的情報共享與強化自主防禦能力，提升「國防自主」與「不對稱作戰」的建設。尤其是台灣現有的愛國者三型**(PAC-3)**與天宮三型防空飛彈主要用於攔截高空彈道飛彈，若解放軍在第一波攻擊中同樣使用具有變軌能力的短程彈道飛彈**(**如東風**-15B/16)**或遠程火箭炮**(**如**PCL-191)**搭載集束彈頭，在台灣空軍基地散步，現有的防空系統難以抵禦。台灣應加速提身戰機的「野戰滑行起降」**(field strip operations)**與強化基地的「快速跑道修復」**(rapid runway repair)**能力，使戰機不至於全部被摧毀於機堡或主跑道時，在短時間內搶出一條可供戰機滑行與起降的安全帶，使基地能迅速恢復運作。並從「源頭打擊」或發展「雷射與微波武器」，一個是對方還在地面準備時便將母彈炸毀於地面，另一個方法是不透過實體飛彈而是能量束掃射天空，將子彈燒毀，用低成本以解決數量問題。

總而言之，北韓試射不僅是一場區域衝突，更是對台海防衛的一面鏡子。面對多線衝突與不對稱飽和打擊的新常態，台灣應對策略應著重於加速推進野戰滑行起降與快速跑道修復，積極發展源頭打擊能力與雷射微波武器，並強化情報共享，以落實國防自主。畢竟和平從不建立於敵人的仁慈與大國的態度上，唯有自身具備不可動搖的防衛底氣，才能在多變的局勢中守住自身的和平。

投書

劉詠婕–多米諾骨牌已倒下：歐盟秘密兵推的殘酷現實，與給台灣的終極警鐘

近期根據多份國際權威媒體紛紛揭露了一場歐盟內部針對台海爆發衝突所進行的秘密兵推與地緣經濟評估。這份報告的結果徹底打破了歐盟各國的沉默:衝突爆發的第一年，歐盟經濟將付出高達2兆美元的慘痛損失，而身為的歐洲經濟龍頭的德國，GDP將面臨14%的斷崖式暴跌。但令歐洲官員寒心的並非是單純的經濟損失，而是危機來臨時盟友之間的殘酷現實。

這場兵推的導火線源自於今年一月中國軍用無人機飛越台灣東沙島領空，這場蠶食行動引發了歐盟對印太局勢突變的集體恐慌。然而，這場兵推的震撼彈在於–當半導體晶片因開戰而徹底斷供時，美國將憑藉自身的軍事力量與政治強權，第一時間確保絕大多數的台灣高階晶片供應於自身；相較之下，在印太區域缺乏實質的軍事影響力的歐盟，將面臨在資源分配底層，落得一無所獲的晶片斷供絕境。

而兵推所揭露的殘酷真相，首先是撕開了國際政治中民主同盟的虛偽面紗。平時在國際上，歐美各國共同高喊著「價值觀一致」與「打造堅韌的供應鏈」，然而到了攸關生死存亡的戰略物資匱乏之時，國際關係瞬間被打回了現實主義的框架中。這場晶片爭奪戰，表明了在極端情況下的現實利益面前，同盟內部仍存在著尊卑的順序。美國利用強權優勢毫不猶豫的落實「美國優先」；而在關係中缺乏實質話語權的歐洲，在危機發生時仍會被排除於核心利益之外，被降級為二等同盟。

更深層的無力在於，這凸顯了歐洲在現代地緣政治中命運與其能力脫鉤的困境，歐洲的製造業與醫療體系命脈高度與遠在數千公里之外的台灣海峽綁定，但歐洲在印太地區的政治籌碼與話語權近乎為零。自身的命運完全受制於大國的意志，甚至連上談判桌上一同分贓、談判自保的資格都沒有，這殘酷的現實才是歐洲高層的集體焦慮。歐洲正被迫面對一個現實:若發生了這場衝突，他們無法阻止，卻必須為了衝突買單代價。

(接續下頁**)**

而這份深刻的焦慮，也正在扭轉西方盟友之間的合作架構。這場兵推的殘酷結論，成為歐洲對美國的信任危機轉折點，並直接催化了歐洲的保護主義自救。這也解釋了在近期所推動的《晶片法案 2.0》，甚至擬定修法賦予政府於危機時強制干預晶片供應鏈，包含製造商優先處理關鍵訂單、提供供應鏈資訊等。這也顯示了歐洲正拋棄對跨國同盟的盲目幻想，轉為各自謀生、自建城牆的防禦姿態。當全球科技供應鏈從原本的「美歐一體」轉為「各自為營」之時，這場兵推的最終結論，恐怕正是西方陣營走向了實質分裂的第一張多米諾骨牌。

總而言之，這場兵推不僅是歐洲的集體焦慮，更是對所以過度依賴大國承諾之國家的警鐘。它證明了在國際政治的叢林法則中，沒有絕對的盟友，只有永恆的國家利益。當危機降臨時，強權會毫不猶豫的搶走最後的希望，而弱者只能夠任人宰割、自求多福。連身為西方陣營核心、經濟體量巨大的歐盟，在利益關頭都難逃被邊緣化的命運，那麼身處於地緣政治風暴中心、處境更加孤立的台灣，更不應該對外界的無私施捨抱持著盲目的幻想。歐洲的焦慮與自救正是台灣的教科書，唯有看清強權將自身利益優先的現實，放棄將自身押注於他人的口頭承諾，才能在各自為營的局勢中，找到真正能夠賴以為生的實力。

投書

劉詠婕–變局中的矽盾崩解:從「全球化樞紐」到「強權矽鎖」的台灣困境

過去的三十年來，「市場效率」與「跨國分工」曾是全球化體系牢不可破的底層代碼:晶片設計於美國、製造於台灣、封測於東南亞、市場於中國。而在這之中，台灣成為不可或缺的樞紐。然而，進入2020年代中期，「科技民族主義」席捲全球，各國政府的晶片法案、高額補貼或出口禁令，正式宣告半導體已從「商品」轉為「戰略物資」。

傳統觀念認為，台灣因掌握了全球高階晶片製造，使大國因忌憚經濟崩潰而不敢輕舉妄動，形成一種經濟相互依存帶來的和平，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矽盾」，但是在當前國際關係的新常態中，這面矽盾非但無法保證和平，反而正在被大國的「矽鎖」戰略進行解構。

美國優先的長臂干涉:防範盟友跨界的窒息戰略

過去我們天真以為在全球化分工的背景下，一旦台灣海峽戰火點燃，全球經濟將面臨雪崩式崩潰，使各國不敢輕舉妄動。但現在強權發現，全球化分工並沒有消除戰爭風險，反而將半導體產業的核心環節，成為被個別國家壟斷的咽喉點，進而將其轉作為打擊潛在對手的武器，也就是矽鎖。不論是中國限制稀土出口，抑或是美國聯合荷蘭限制ASML設備與先進AI晶片出口，都顯示了全球經濟從互利共生轉變成了相互制衡。而台灣掌握的先進製程，再大國眼中也不再是和平的紐帶，而是隨時可能被戰火所切斷的安全死穴。

對美國來說，矽鎖戰略的核心宗旨是「美國優先」，為此防的不只是敵人，更是防所有可能脫離控制的盟友。像是近期美國懷疑ASML其EUV設備零件流入中國，違反了由美國所主導的出口管制禁令，即使ASML發表澄清，但美方的施壓，本質上是透過國安問題來確保這家歐洲半導體設備巨頭，不敢偏離美國所設的戰略計畫；而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 (FTC) 對英國晶片架構設計巨頭Arm進行了反壟斷調查，檢視是否會「拒絕或降低CPU的設計藍圖授權品質」，因全球高科技的巨投(例:蘋果)的底層晶片皆在Arm的IP架構上，而Arm近期宣布從傳統IP授權模式擴展至晶片製造領域，美國須確保其科技盟友只能作為美國晶片下游的技術供應商，無法反過來威脅美國本土科技業。

(下頁接續)

投書

美日歐的半導體爭奪瓜分台灣矽盾

這種對盟友的技術牽制與防範，同樣也落實在台灣身上，且更加侵略性。大國為了消除潛在台海戰火導致晶片製成切斷的問題，開始透過《晶片與科學法案》中的十年條款以及各種長臂管轄的法律工具，強行要求台灣將最尖端的科技產能進行物理性的全球分散。實質剝奪台灣過去賴以防禦的技術時間差，也就是等到台灣本土已成功進入下一代更先進製程，才允許前一代製程技術移往國外。迫使台灣在非自願情況下，向海外同步交出最核心的製造秘密。

此外，這條法案，在拆解台灣矽盾的同時，也徹底激活其他科技盟友的潛在野心。表面上，日本與歐洲各國配合美國的分散地緣政治風險政策，實際上是培養自身的產業。日本藉由快速推進熊本廠來重振晶片霸權；歐洲在德國建立歐積電（ESMC），將歐洲晶片控制權掌握於自己手上。而在這情況下，台灣無可避免地陷入了兩難困境。若不配合，將立即面臨美國長臂管轄法律制裁與市場抵制，排除於全球科技供應鏈之外；然而若配合，則意謂眼睜睜看著引以為傲的矽盾被瓜分殆盡。

矽盾維持:以搬不走的先進技術築起新的防線

全球半導體已進入另一時代，美國利用矽鎖劃定界線，盟友若配合自身，便可分享商業利潤，但技術與產能的絕對掌控必須得在美國手上。而台灣晶片產業則是在強權眼中，成了被人瓜分的大餅，人人都想分一塊，但無人在乎這塊土地。在這境遇下，台灣已退無可退了。未來存活的關鍵，是不能再盲目地對盟友毫無保留，而是必須配合海外設廠時，在島內盡力研發出無法被大國複製、無法被搬走、不可或缺的技術。唯有讓本島得技術持續領先，永遠超過強權拆解矽盾的進程，才可重新築起新的防線。

投書

陳品璇—清大校園的外籍朋友：從大學生視角看新南向人才交流

蔡英文總統於2016年正式提出新南向政策，至今已滿十年，有別於過去李登輝及陳水扁總統多著重於經貿投資的南向政策（1993-2003），新南向政策旨在促進與新南向18國各層面的交流，進而建立「經濟共同體意識」。政策設計上分為四大工作主軸，分別為經貿合作、人才交流、資源共享以及區域鏈結。其中，在人才交流方面更主張「以人為本」，透過各項補助及培育措施，推動與新南向國家之人才交流，以強化臺灣與新南向國家之間的雙向鏈結。

身在清華校園，每日在圖書館、小吃部和體育場間穿梭，都能見到許多新南向外籍生的身影。儘管這些外籍生與台灣學生一同在清華學習、生活並參與校園活動，但與外籍生的交流，多停留在體育課與通識分組，較少有長期且正式的管道發展學術交流或共同舉辦活動。

雖然外籍生社群廣大，也經常有印尼會、越南會等社團在小吃部外宣傳國家美食分享活動，然而，在語言隔閡和文化差異下，對許多台灣學生而言，仍較難主動參與陌生的異國文化交流，並與外籍朋友建立長期友誼。多數交流停留在相識層面，見面時打個招呼，之後便回到自己的舒適圈，與熟悉的本國學生交朋友。

2019年，清大將原人文社會學院國際生學士學位學程改名為「清華學院國際學士班」，此為校內許多外籍朋友就讀的系所。清大114學年度在學學生數為18,393人，境外學位生數為1,820 人，境外生占在學學生比約9.9%。換言之，清大平均每十位學生中，便有一位是境外生。

其中，根據113年大專校院境外學生概況，亞洲學生占清大校內外籍生85.1%，其中58.0%來自東南亞的新南向國家，其次則有17.4%來自陸港澳地區。由此可見，過半的校內外籍生皆是新南向人才交流政策的目標對象。

(接續下頁)

投書

除113年外籍生占比約達六成外，從105至106年，清大校園內新南向國家的外籍生人數自584人攀升至827人，年增率高達41.9%，之後逐步上升至約1,500人左右，人數已是新南向政策推動前的近三倍。從時間點來看，此趨勢與2016年政府推動新南向人才交流、高教國際化的方向高度重疊。

新南向的人才交流政策，對國內青年學子的政策目標為--具備「經貿管理」、「文化理解」及「東協語言」能力。然而，就我在清華校園內的觀察而言，儘管大量新南向學生來台，一般學生也鮮少與他們建立長期關係，達成所謂雙向、多元的交流。大多數人只是在同一個校園內，過著各自安好的生活。

此外，在我認識的非華裔外籍生中，大部分人的中文並不流利，需要以英文溝通，也無法讀寫中文；而在課程設計上，與台灣學生也似乎也存在某種隔離。不論是必選修課還是通識課，外籍生多參與全英語授課課程，讓人不禁思考：究竟該如何達到增進「華語溝通能力」的政策目標？

不過，雖然不同學籍學生間的實質交流有限，但我在學期間感受到更多的，是習慣有新南向國家的學生在相同的校園中的生活。雖稱不上真正熟悉彼此，但也不再如以往那般陌生。

新南向人才交流政策推動至今，除了來臺求學人數的大幅增長之外，或許也該開始思考：在數字以外，學生之間的交流如何過渡到去瞭解彼此文化，並建立長期且正式的管道，促進台灣學生與新南向國家學生在校園中的實質互動。

投書

陳品璇—高教國際化的缺口：談大學校園中的政治缺席

近年來，台灣高等教育積極推動「國際化」。從 EMI全英語課程、交換學生計畫，到大學國際排名與海外合作，國際化成為各大學共同追求的目標。然而，在這些制度與指標之外，我們卻很少定義什麼才是真正的國際觀？
許多人將國際觀等同於英文能力、跨國交流或海外經驗，但真正的國際觀，從來不只是語言能力的展現，而是對自身國家處境的理解，以及在國際秩序中的定位認知，既然國際秩序本身就是政治問題，那麼去政治化的大學有培養國際人才的土壤嗎？

無論是邦交國議題、兩岸關係、國際組織參與，或台灣在美中競爭中的角色，都影響著台灣青年如何理解世界、如何與國際社會互動。然而，大學作為學生邁入社會前的過渡期，卻將政治排除於校園環境之外，彷彿只要避免談論政治，就能減去潛在的溝通成本。

問題在於國際化本身就無法脫離政治，當大學一方面強調培養學生的國際視野，另一方面卻不願提供討論國際政治的空間時，所謂的國際化，只剩下語言能力與履歷競爭。學生或許能流利地以英文介紹自己，卻難以回答「台灣在國際上為何重要」、「台灣該如何看待與中國的關係」等問題，學生缺乏對自身處境的理解，再多的交換與交流，也只是形式上的國際接觸。

許多人擔心政治立場的差異，可能造成學生間的對立、偏見與衝突，因此傾向讓校園遠離政治。然而，不討論並不代表問題不存在。相反地，當學生缺乏理性討論公共議題的經驗，只會更難理解自身所處的現實，也更容易在進入社會後，被情緒化與碎片化的資訊所影響。

大學作為學生邁入社會前的重要場域，本就不應只有專業知識的訓練，也應該培養對社會議題的思辨能力。真正成熟的國際化教育，不只是讓學生「看見世界」，更是讓學生理解自己與世界的關係。
因此，校園中的政治討論，不該被視為國際化的阻礙，而應該是其基礎。大學是否能在不同立場之間提供理性對話的空間，也決定了台灣未來的走向。

投書

陳品璇—新冷戰時代：美中俄的大國角力

冷戰結束之初，許多人相信世界正朝著全球化與國際合作前進。
美國以勝者姿態成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強權，中國改革開放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俄國也藉由與美國對抗恐怖主義，一度嘗試融入西方體系。當時的主流想像是：經濟富裕會讓中國人民有能力去要求更多權力，因此資本主義會帶動民主化，而大國之間的全面對抗，將成為過去式。

但如今，這樣的想像早已崩解。
從俄烏戰爭、中美科技戰，到中國與俄羅斯越來越緊密的合作關係，世界重新踏入一種「新冷戰」的局勢。這與過去美蘇冷戰的形式不同，沒有明確的勝利樣貌，而是一種更模糊也更危險的大國競爭。

根據《新冷戰：中國崛起、俄國侵略、與美國捍衛西方之戰》一書的內容，新冷戰的形成，主要圍繞在兩條主線：中美對抗，以及中俄聯手對抗西方。

俄烏戰爭，是將大國潛在的對立關係，正式以新冷戰一詞浮上檯面的節點。2014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並吞克里米亞，之後又持續在烏東地區發動低強度戰爭。到了2022年，俄軍全面入侵烏克蘭，歐洲再次出現大型戰爭。普丁一再強調「烏克蘭並非獨立國家，而是昔日帝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映出普丁對對於帝國主義的執著。

在俄國眼中，北約持續東擴、美國影響力不斷逼近俄國邊界，都是對俄國安全與地位的威脅。普丁並不接受冷戰後由美國主導的單極世界，因此一直試圖收復過去俄羅斯附庸國的領土，從車臣、喬治亞、克里米亞，到烏克蘭，俄國幾乎每隔七年便透過軍事行動向外擴張。

同時，中國與俄羅斯的關係變化同樣值得注意。
在北京冬奧前夕，習近平與普丁會面，雙方宣稱合作「沒有上限」，並且要聯手對抗西方勢力。中俄之間雖然並非正式軍事同盟，但在政治立場與國際戰略上，雙方已經越來越接近。中國需要俄羅斯的能源與地緣政治合作，俄羅斯則需要中國在經濟與外交上的支援。
(接續下頁)

另一方面，中美關係的惡化，是新冷戰形成的第二大主因。
過去，美國曾經相信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會因為經濟開放而逐漸走向政治自由化。柯林頓認為：中國人民在獲得經濟自由後，會要求更多政治權利。美國長期希望將中國拉進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相信經濟合作最終將改變中國。

但結果並非如此。
中國在加入世貿後快速崛起，成為全球製造中心，展示威權體制與市場經濟能夠並存，同時大力發展科技與軍事力量。從中國製造2025、大規模補貼科技企業，到半導體、5G與人工智慧的競爭，中國逐漸被美國視為最重要的戰略挑戰。

尤其在習近平上台後，中國對香港、台灣、南海與科技領域的態度越來越強硬，也讓美國開始改變過去對中國的想像。直到中國國安部竊取美國聯邦雇員及家屬的數位安全資料，美國財對中國的態度撤底從不信任轉為厭惡，甚至開始正視中美是否終將一戰。

川普上任後的中美貿易戰，開始對中國科技企業進行限制，對華為、半導體與中國供應鏈展開打壓；而中國則持續透過科技、製造與市場影響力擴張自身地位。到了拜登政府，美國進一步推動晶片法案以及供應鏈重組，希望降低對中國的依賴。

這種對抗與舊冷戰最大的不同，在於全球化沒有真正結束。
過去美蘇冷戰時，雙方經濟幾乎完全切割；但今日的中美卻彼此高度依賴。中國是全球製造中心，美國則掌握金融、科技與國際制度優勢。雙方雖然競爭，又無法完全脫鉤，因此使新冷戰更加矛盾與複雜。

對台灣而言，新冷戰不是遙遠的國際新聞。
台灣位於中美對抗的核心位置，同時也是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的重要據點，從台積電、美中科技戰，到台海安全問題，台灣都處在最前線。

因此，新冷戰並不是另一場冷戰，它代表的是：冷戰後那種「全球化會帶來和平」的樂觀想像，正在被現實推翻，而未來世界會走向全面衝突、長期對峙，還是新的平衡，正取決於我們今天的選擇。

投書

陳品璇—從《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看台灣民主化的意義

在韓國電影「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中，大學生朴鍾哲被反共調查處處長朴處源的手下嚴刑逼供致死，政府試圖以快速火化遺體的方式解決。其中檢察官堅守職責，沒有因為賄賂與威脅而草率簽署火化同意書，真相也在報社記者的挖掘下浮出水面。然而，朴處源為了不影響全斗煥總統政權穩定，派遣手下威脅與賄賂相關人士，主角妍熙的舅舅也因為與反對黨領袖金正南傳訊而遭受酷刑。這些情節讓我看見權威時代下的不人道，人的生命安全會因政治權力而被踐踏。

反派朴處源早年目睹親人被共產黨殺害而懷恨在心，因此相信自己是在保衛國家、對抗共產勢力，卻用同樣的殘暴手段對待其他人。當政權用「國家安全」或「反共」作為理由，無限制地壓迫人民時，個人的仇恨與權力不該被包裝成正當行為。電影中妍熙的學長李韓烈在電影社播放光州事件的影片，面對妍熙傷心的質問時，他坦言自己也知道要照顧家人的感受，但仍舊會因為心痛而無法坐視不管。那個時代的學生與社運人士，正是因為無法忍受這樣的不公不義，才會和李韓烈一樣站上街頭。

值得一提的是，電影以妍熙作為主角推進劇情，妍熙不像李韓烈一樣是定位鮮明的學運人士，也不像舅舅一樣直接參與反對黨的政治活動，她的身分似乎與整個事件沒有直接關聯，反而更像是在時代變局中的一般人。透過她的視角，觀眾能代入那個時代下普通人的矛盾：一方面知道社會充滿不公不義，另一方面又覺得自己無力改變，也擔心家人的安危。直到最後，李韓烈在學運中被催淚彈擊中，妍熙才著急趕往現場。最終，站在巴士上看見舉國抗議的壯觀場面，才感受到每個人微弱的勇氣能聚集成推動時代變化的力量。結局非常令人感動，讓人看見民主化需要許多普通人在某一刻不再選擇沉默。

此外，在電影中能看見即使在極權控制之下，仍有報社記者、檢察官、獄警願意堅守信念，不受威逼利誘，在壓迫的環境中做出善良的選擇。甚至連朴處源的手下，也開始懷疑「用酷刑對待這麼多人，真的是為了國家好嗎？」觀眾能藉此認真思考民主化的重要性。當一個社會的大環境是民主且重視人權的，權力較低或內心搖擺的人，才不會因為極權所迫而失去判斷與選擇的自由，成為傷害他人的工具。

(接續下頁)

連結到台灣，民主化讓台灣的對外政策不再是少數統治者或單一政黨的決定，而必須受到選舉、媒體與公民社會的監督。政府在做外交決策時，不能為了政權利益而代表全體人民做決定，必須考量社會對自由、人權、安全與主權的重視。這使台灣的對外關係有時看起來比較複雜，因為不同民意有不同聲音，但也更能反映人民真正的選擇。

其次，民主化也讓台灣在國際上形成一種重要的身分認同。台灣不像許多國家一樣擁有完整的外交承認空間，但民主、人權與法治成為台灣和其他民主國家建立連結的重要基礎。當台灣與理念相近的國家合作時，民主制度使台灣更容易被視為可信任的夥伴，而不只是地緣政治中的一個符號。這也是政府所強調的，民主價值是台灣對外關係中的重要資產。

最後，從這部電影回看台灣民主化，我會更珍視現在能夠表達意見、批評政府、參與公共討論的自由。這些自由看起來日常，卻是許多人承受壓迫後換來的結果。民主化對台灣對外關係的影響，不只是讓台灣更接近其他民主國家，也讓台灣在面對外部壓力時，能夠以人民意志作為基礎。一個值得人民嚮往的國家，不只是政府擁有權力，而是人民能夠參與、監督並共同決定國家的方向，民主並不是理所當然的制度，更是需要持續守護的生活方式。

投書

朱蕾靜—「Z世代整頓政壇」之後：尼泊爾Z世代內閣的治理難題，與台灣的韌性借鏡

導言：尼泊爾的青年們走過激烈的街頭抗爭與政府鎮壓，最終成功用選票推翻舊體制，並選出了「饒舌歌手總理＋Z世代內閣」的全新政府--然而，真正嚴峻的考驗，此刻才剛剛開始。

2025年9月4日，尼泊爾政府頒布多項社群媒體禁令引發Gen Z大規模抗議，隨後更在鐵腕鎮壓下造成數十人死亡，數千人受傷。憤怒的年輕世代受夠了舊體制的貪腐，高官子女的奢糜對比長期民生經濟成長低落、基礎建設嚴重不足的現實社會。

青年們透過Discord跨網集結、施壓，最終促成了一位臨時、也是該國第一位女總理的誕生，展現著新世代透過數位力量「整頓政壇」的強大力量。

．關聯閱讀：《全球首例！尼泊爾用Discord選出新總理：一次看懂前因後果、正反評價、新總理是誰？》

「Z世代內閣」的顛簸開局

今年3月，尼泊爾人民再次用選票告訴世界，變革的時代即將來臨，下架長期霸占席次與總理職位的尼泊爾大會黨與共產黨等傳統老黨。

現任尼泊爾總理巴倫．沙阿（Balen Shah），不只是一位35歲的饒舌歌手、工程師，也有著當地少數民族馬德西人（Madheshi）的身分，他帶領著民族自由黨（RSP）取得壓倒性的勝利，並組成世界上最年輕，多數閣員僅2、30歲的內閣。

然而，這場象徵著Z世代成功翻盤、「整頓政壇」的改革，實際走出的第一步卻有些坎坷：上任不到一個月，新政府接連發生內政部長涉嫌財務違規、對印度商品徵收有爭議的關稅、頒布學生會禁令等事件，很快也面臨民眾上街抗議。

這兩場矛盾的抗議，為我們揭示了推翻體制沈屙靠的是熱血青年的社會韌性；但要帶領一個百廢待舉的國家走向繁榮，需要的卻是溝通妥協、資源分配與長遠的經濟戰略。

(接續下頁)

投書

作為一個曾在尼泊爾擔任國際教育志工的台灣青年，這場我切身體會的政治巨變，不僅為我上了一堂最真實的經濟與組織管理課，更讓我重新省思世界公民的責任與台灣的未來。

見證當地青年的困境與覺醒

幾個月前，亞洲彼端的政治動盪對我而言仍是遙遠的國際新聞，如過眼雲煙般事不關己。直到去年夏天，我在尼泊爾加德滿都大學附設高中（KUHS）擔任教育志工，在電腦課上教導 7 到9 年級（如台灣國一到國三）的學生 AI 在學科上的應用，認識了許多當地青年朋友，才對當地的青年困局有了切身的理解與感受。

我親眼看見當地學生眼裡對知識的渴望與驚人的天賦。然而，這樣充沛的「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卻受困於殘破的基礎建設--頻繁的停電、不穩定的網路、老舊的設備，以及因為地形與政府失能而始終停滯的發展機會。

而就在我剛教完他們「網路安全」不久，2025 年 9 月，尼泊爾政府竟直接頒布社群媒體禁令，引爆了全國性的抗爭。原本在 Global Village 與我相擁、同桌共飲 Lassi（一種尼泊爾的飲料，像優酪乳）的當地朋友們，他們的 Instagram 也從分享日常，變成了黑煙瀰漫的街頭影片與求救訊號。
那一刻，我深刻體認到，我們緊密相連。這份跨文化的羈絆賦予了我發聲的權利，也成為我作為世界公民的責任。

尼泊爾青年的憤怒，被部分媒體簡化為「不能滑手機」，但實情遠遠不止如此：從經濟學的基礎邏輯來看，這是對長期資源錯配、高失業率，以及青年被迫出國當移工的生存怒吼。尼泊爾青年失業率高達 20.6%，為南亞最高，不僅壓抑消費與投資、阻礙經濟成長，更代表著嚴重的社會不公現象。
隨著社群上 #NepoBaby 與#NepoKids 標籤爆紅，陸續揭露高官子女炫富與裙帶關係，凸顯當地菁英壟斷機會資源，青年們更紛紛意識到現行體制已是腐敗與無效率的死局，遂轉向體制外的街頭抗爭。

民主的考驗在勝選之後

當時看著他們面對巔頂體制與警察暴力，在街頭展現的無畏，不禁讓我聯想到台灣 2014 年的太陽花學運。尼泊爾青年展現出的氣魄，正是一個國家最核心的「社會韌性」（Social Resilience）--當政府失能、違背主流民意時，人民依然具備由下而上、強制修正國家錯誤路線的動員能力。
(接續下頁)

投書

然而，「破壞舊制度」從不等於「建立新秩序」：尼泊爾人民選擇了一位體制外的 35 歲青年總理，或許是打破劣幣驅逐良幣的必要之惡，但 Balen Shah 上任後立刻遭遇的反彈，也正說明了尼泊爾年輕世代從「抗爭者」轉型為「管理者」的巨大挑戰。

以近期引發爭議的「學生會禁令」為例。或許總理的出發點是好的，希望讓校園去政治化、回歸單純的學習環境；但治理一個國家，猶如經營一個龐大組織，任何變革都需要透明的溝通與漸進式的過渡。一紙缺乏對話的禁令，加上隨之而來的內政部長爭議與關稅問題，顯示新政府在策略擬定與資源配置上，仍缺乏成熟的財務模型與管理思維。

顯然，改革之後的路更需要團結，新政府必須學會善用這股青年帶起的社會動能，而非站在其對立面。

回到台灣，我們擁有傲視全球的半導體產業鏈與相對成熟的文官體制，但我們是否因此視民主為理所當然？如果今天台灣也面臨極端的地緣政治壓力或內部崩壞，換作是我，能有他們這般不計代價為國家挺身的膽識與氣魄嗎？過去，我以為和平（PEACE）只是沒有戰爭的安逸；但遠在亞洲彼端的尼泊爾友人教會我，真正的和平，是國際間積極人道的關懷，出於世界之友的互助互信。期許同為青年的自己，未來能帶著這份震撼，發揮更積極的影響力--因為民主的價值不僅在於我們擁有什麼，更在我們願意為了保護所愛的人事物，付出多少努力。



2026/5/5刊登至換日線

投書

朱蕾靜—從人社班退場看「人才荷蘭病」：教育政策應以文理共生重塑國家韌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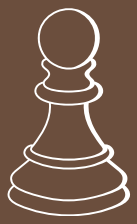
近年來，隨著台灣半導體產業在全球供應鏈中稱霸，關於台灣經濟是否罹患「荷蘭病」(Dutch Disease)的討論甚囂塵上。中央銀行曾發布報告，以傳統經濟學指標出發，強調台灣傳產出口長期與全球需求同向，且並未因勞動供給減少而出現異常工資上漲，因此否認台灣患有此病。然而，這種停留在狹義匯率與出口數字的分析，卻忽略了台灣經濟體系中正劇烈發酵的「變種荷蘭病」--在要素稟賦的巨大磁吸效應下，資源與頂尖大腦的極度傾斜，已然引發嚴重的「人才荷蘭病」。

近期，建中、北一女、台南一中等頂尖高中的人文社會資優班相繼面臨停招或轉型，甚至台中一中的語文資優班也預計於2026年停招。這並非單純的教育界「文組悲歌」，而是強烈市場訊號引導下的必然結果。當資通訊產業的平均起薪高達5.9萬，遠超人文社科領域的3.4萬時，追求經濟安全的理性選擇，使得大學端科技類學生比例逼近五成，而人文類卻跌破兩成。與此同時，國家的科研經費補助也展現了懸殊的差距，工程處與自然處獲取了龐大的資源，遠超人文處與科教國合處的總和。

從國際關係與地緣政治的宏觀視角來看，這種「重理輕文」的結構性傾斜，源自於國家層面的「矽盾」自保戰略。1970年代，台灣經歷退出聯合國、中美斷交與石油危機，在外交孤立無援下，急需一張新的「國際護身符」。將台灣打造成全球供應鏈中不可替代的節點，是小國追求國防安全的絕對理性戰略。然而，過度向單一產業傾斜以換取生存的同時，台灣也正在支付極其高昂的機會成本。

在當今大國博弈的經貿戰場上，現代戰爭與外交斡旋早已模糊了學科界線。AI的發展與治理迫切需要倫理與法律基礎；半導體出口管制牽涉到高度複雜的地緣政治與外交談判；而面對認知作戰與資訊戰的防禦，更需要深刻的社會心理學與資訊傳播分析。

(接續下頁)



投書

台灣的矽盾雖然堅不可摧，但它終究只是「硬體」；要讓這面矽盾在國際談判桌上發揮最大槓桿效益，我們亟需的是具備「地緣戰略大腦」的「軟體」人才。當舉國上下的頂尖學子都湧入理科、走向無塵室，我們將面臨一個致命的戰略真空：誰來穿梭於華府、東京與歐洲各國智庫之間，用精準的國際政治語言為台灣爭取最大利益？誰能同時理解「晶片先進製程」與「國際政經角力」交織的跨界棋局？

真正的國家韌性（Resilience），始終來自於系統的多樣性，單一化往往是最大的脆弱所在。面對詭譎多變的國際新局勢，台灣不能只有卓越的工程師與製程專家，我們同樣需要深諳全球宏觀經濟與大國博弈脈絡的戰略家。台灣的下一步，必須打破「文理分家」的二元對立，走向「文理共生」。唯有建立涵蓋科技實力與人文社會思辨的跨界人才庫，補足失落的地緣戰略大腦，台灣才能在下一個五十年，穩健地立足於世界舞台。

投書

朱蕾靜— 【書評】拒絕宿命論的小國生存學：從《新加坡大戰略》看台灣的突圍與軟韌性

在巨頭博弈越演越烈的今天，我們時常聽見「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的地緣政治焦慮。然而，身處大國夾縫中的小國，難道只能被動地成為籌碼或附庸嗎？洪清海（Ang Cheng Guan）所著的《新加坡大戰略》給出了一個極具力量的答案：即使是小國，也可以有大戰略；小國絕不能作任何國家的附庸。

這本書不僅是一部建國史，更是一套為資源匱乏國家量身打造的「生存工具箱」。從新加坡的戰略演進中，我們能看見一種將「先天限制」轉化為「絕對優勢」的強大底氣。

脆弱感驅動的絕對理性：經濟即國防

從總體經濟學的視角檢視，新加坡的先天條件極度惡劣：缺乏自然資源，甚至連基本水源都無法自給自足。然而，正是這種極致的「脆弱感」，驅使他們發展出將經濟與國防完全綁定的理性戰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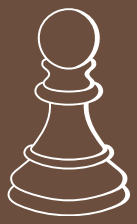
建國初期，面對國內市場狹小的瓶頸，新加坡並未走向保護主義，而是大膽地將「世界當作腹地」。透過推動多邊合作與自由貿易協定（FTA），新加坡讓自己成為全球供應鏈中不可或缺的「催化劑」與「火星塞」。

這種戰略的精明之處在於「身分脫鉤」。在國際舞台上，新加坡極力淡化可能引發周邊國家敏感神經的種族或政治標籤，轉而打造「透明的金融中心」與「技術領先者」等功能性身分。當一個國家的繁榮與全球利益形成深度的「共生關係」時，封殺這個國家就等同於傷害全球經濟。這不僅是高明的經濟決策，更是最堅固的國防護城河。

堅守國際法治：從「毒蝦」到「豪豬」的底氣

在外交光譜上，新加坡時常被認為是務實且不結盟的。但「不結盟」不代表「沒有原則」。書中一個令我印象深刻的論點是：新加坡對於維護國際法的態度極度強硬且一致。

(接續下頁)



投書

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時，新加坡基於「今日柬埔寨，明日新加坡」的恐懼，強烈譴責並發起外交抵制。同樣地，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新加坡成為東協中唯一強烈譴責俄羅斯的國家。這並非單純的道德表態，而是踩死了小國生存的絕對底線：如果叢林法則凌駕於國際法之上，大國能隨意吞併小國，那所有的中小國家將永無寧日。

當然，敢於在國際上大聲說話，背後必須有硬實力支撐。從李光耀時期的「毒蝦戰略」（讓吞食者付出慘痛代價），到如今整合了數位防衛（Digital Defence）與高科技武裝部隊的「豪豬戰略」，新加坡證明了：只有在軍事與經濟上做好充分準備，小國才有底氣在關鍵時刻拒絕政治勒索。

隱形外交與青年軟韌性：台灣的集體發聲之道

回頭審視台灣，我們的外交舞台比新加坡受限許多，既非聯合國成員，也無法輕易參與東協等區域多邊機制。在傳統政治舞台受限的情況下，我們該如何創造屬於自己的「集體發聲」管道？

實際投入跨國青年組織的運作便會發現，「非傳統、非政治」的民間交流，往往具備極強的穿透力。當青年世代在推動跨國的永續發展、教育或文化專案時，表面上雖然不涉及國家利益的博弈，但實際上卻是在建構一條深不見底的「信任網絡」（Trust Network）。

這些跨國專案的參與者，未來都可能成為各國的決策者或意見領袖。透過青年主導的實質國民外交，我們能讓國際社會親身經歷台灣的民主韌性與價值。這種「軟韌性」雖然沒有軍事條約的硬性約束，卻能為台灣建立強大的「社會免疫力」與國際友誼。我們不需要苦等別人給予舞台，而是有能力自己搭起舞台，讓世界看見台灣的不可替代性。

結語：準備好自己，就是最大的韌性

《新加坡大戰略》給予我們最深刻的啟示是：小國或許有先天的限制，但我們絕不能陷入「宿命論」。

面對未來「垂直世界」的陣營化與全球化倒退危機，台灣不能只停留在訴諸悲情的「受難者」角色。我們必須學習新加坡的戰略定力，將自身定位為解決全球供應鏈與資安問題的「防護者」。

無論是建立東南亞最強大的數位與實體防衛，還是透過民間與青年力量向外擴展信任網絡，生存從來都不是依賴他國的施捨。看清國際現實，並在經濟、國防與民間外交上做足準備，這才是小國在巨頭博弈中，最堅不可摧的國家韌性。

投書

朱蕾靜—拒絕成為大國棋子：從《真實烏托邦》看台灣「人人外交」的真實防禦力

身處中美對抗的最前線，打開國際新聞，台灣總是被賦予各種標籤：「地緣政治的火藥庫」、「不可或缺的矽盾」、或是「強權博弈的棋子」。在傳統國際關係的現實主義論述裡，國家就像商品，隨時能被放在大國的天平上秤斤論兩。

身為一名主修經濟的大學生，我長期沉浸在自由市場與「看不見的手」的邏輯中，直到我翻開了社會學家 Erik Olin Wright 的《真實烏托邦》（*Envisioning Real Utopias*）。這本原本旨在批判資本主義、尋找體制替代方案的社會學巨作，卻宛如一記警鐘，精準刺穿了台灣當前的地緣政治困境，並指引出一條突圍的戰略路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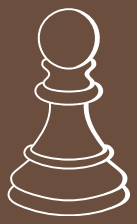
萊特在書中指出，權力分為三種：國家權力、經濟權力與社會權力。當台灣在「國家權力」（如聯合國等官方外交管道）遭到全面封殺，而「經濟權力」（半導體產業）又高度依賴全球供應鏈且隨時可能被當作交易籌碼時，我們真正的護城河究竟在哪裡？答案，藏在萊特所說的「社會賦權」裡。

數位間隙裡的迷思：鍵盤上的民主盾牌？
萊特主張，我們必須在現有體制的「間隙」中，由下而上建立具備民主與平權的替代方案。社群媒體，似乎就是這個時代最完美的「數位間隙」。

幾年前，當我還是一名在台中就讀高中的學生時，我進行了一項實證研究：探討 Instagram 對高中生政治參與的影響（以爭取延後上學時間為例）。當時，我們以為社群網路能讓缺乏政治權力的學生，繞過僵化的校園官僚，發起一場由下而上的「微型民主革命」。

然而，當冷冰冰的問卷數據擺在眼前，我卻看見了數位烏托邦的殘酷現實。研究結果顯示：「高中生的意見表達遠大於實際行動」，且「IG 僅對原本就有政治參與經驗的人影響極高」。

這意味著，數位平台並沒有達成真正的「社會賦權」，它只是極大化了低成本的「懶人行動主義（Slacktivism）」；多數人只停留在轉發限時動態宣洩情緒，而非投入實質的組織與行動。
(接續下頁)



投書

如果我們將這個校園現象放大到國家層次，這正暴露出台灣民主韌性的最大隱憂。當國際社會頻頻讚揚台灣抵抗認知作戰的「社會韌性」時，如果我們年輕世代的參與只停留在鍵盤按讚、在同溫層裡尋求慰藉，一旦面對真實的地緣政治衝突與資訊戰撕裂，這種缺乏實體組織力與集體行動力的公民社會，將會是非常脆弱的。

縫隙中的微光：從開源社群到跨國 NGO 的實踐

既然網路倡議不足以支撐起國家的韌性，真正的「真實烏托邦」該長什麼樣子？

《真實烏托邦》第七章中，萊特舉了「維基百科」與「蒙德拉貢合作社」作為經濟替代方案的典範。這讓我深刻聯想到台灣極度活躍的開源社群與公民科技組織。在參與零時小學校專案的過程中，我看見了台灣社會權力的真實展現。面對資訊孤立與公共議題，這裡不靠資本逐利、不靠國家機器指令，而是由公民自發性地協作，用程式碼打造民主防衛的基礎建設。

更深刻的體會，來自於我擔任 AIESEC 清大分會會長的經歷。

作為一個主修經濟、重視效率的 ENTJ，我深知草根組織不能只有情懷。在帶領分會的期間，我將經濟學的思維與 AI 工具（如 ChatGPT、工作流自動化）導入組織營運，成功將分會人數從 30 人翻倍成長至 60 多人。這段管理經驗讓我明白：所謂的「社會賦權」絕非空談，它需要高度的執行力、策略與制度設計來支撐。

當我帶著團隊參與各項國際大會時，那種震撼是難以言喻的。在那些沒有國旗、沒有官方頭銜的會議桌上，我們與來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共同討論永續發展與跨文化領導力。在那些瞬間，台灣不再是國際新聞裡那個「隨時可能爆發戰爭的危險島嶼」，我們代表著一個充滿活力、追求進步價值的活生生共同體。

「人人外交」：將社會權力轉化為國家防禦力

近年來，台灣政府大力提倡「人人外交」。這項政策的底層邏輯，其實就是國際關係版的「社會賦權」。在現實主義的國際政治中，弱國無外交。但如果我們跳脫傳統的「國家機器」視角，台灣擁有著令許多威權體制恐懼的武器--活躍的 NGO 網絡、不受審查的學術環境、以及願意在國際社會中貢獻己力的公民。

(接續下頁)

無論是協助國際援助的非營利組織、推動氣候變遷倡議的青年代表，還是像 AIESEC 這樣深耕青年領導力的跨國社群，每一次的實質交流，都是在突破強權的封鎖線。我們在全世界的公民心中建立起真實的信任與好感，這種基於「共同價值觀」建立的跨國連結，是任何經濟制裁或武力威嚇都無法輕易切斷的。

結語：我們的願景形塑了世界

《真實烏托邦》在第一章寫道：「我們的願景形塑了世界。」

面對大國博弈的地緣政治，台灣的年輕世代不需要感到無力。我們不是任人定價的商品，也不該只做躲在鍵盤後面的評論家。從高中的問卷反思、g0v 的數位協作，再到帶領 AIESEC 的跨國交流，我深信：台灣最強大的護城河，除了矽盾之外，更是深植於我們日常的民主品質與公民行動力。

當每一個台灣人，都能在體制的間隙中，透過實體組織與跨國交流成為連結世界的節點，這座島嶼本身，就已經是國際社會中最堅韌、最無法被忽視的真實烏托邦。

投書

簡嫚萱-從卡達投資局看地緣政治下的經濟防禦

引言：打破「小國無外交」的傳統迷思

在傳統的國際關係理論中，尤其是現實主義的敘事框架下，國際政治的舞台本質上是一場由大國主導的權力博弈。中小型國家由於缺乏廣袤的國土、龐大的人口以及足夠的軍事硬實力，往往被視為大國棋盤上的「棋子」，或地緣衝突中的「緩衝帶」，缺乏實質的戰略主導權與政策自主性。

然而，位於波斯灣、國土面積僅約 11,500 平方公里的半島小國卡達，卻在過去十年間的劇烈地緣政治風暴中，顛覆了這項行之多年的鐵律。卡達不但在強鄰環伺的環境中存活下來，更走出一條獨樹一幟的經濟防禦之路，在這條戰略路徑中，管理資產規模超過 4,000 億至 5,000 億美元的卡達投資局（QIA），正是其最核心、最精銳的戰略防禦武器。

主權財富基金的戰略轉型：從金融工具到安全防護網

許多財經學者與投資人僅將主權財富基金（SWF）視為一種國家配置海外資產、賺取外匯收益以對抗資源枯竭風險的純金融工具。然而，對於身處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兩大強權夾縫中的卡達而言，QIA 的成立從一開始就帶有深層的安全防禦色彩，它是國家安全戰略的延伸，在國際體制中建構安全防護網的制度化實踐。

主權基金的經濟防禦邏輯，建立在國際關係理論中的複合相互依存之上。小國要生存，不能單靠無法與大國抗衡的軍隊，而必須讓自身的利益與全球核心大國的利益產生血肉相連的交織。當一個小國在國際金融體系、關鍵產業與主要大國的本土市場中，釘下不可拔除的深樁時，它的國家安全就自然而然地轉化成了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換言之，QIA 的海外投資策略，本質上就是一種將國家安全抵押給全球市場的高級戰略。

2017斷交危機：一場經濟防禦的實戰演練

2017 年 6 月，卡達遭遇了建國以來最嚴峻的地緣政治危機。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巴林與埃及等鄰國，突然宣布與卡達斷絕外交關係，並實施海、陸、空全面的經濟封鎖與邊境關閉。這場危機意在通過極限施壓，逼迫卡達放棄其相對獨立的外交政策。

在面臨強鄰壓境、物資可能斷絕、資本瘋狂外逃的危急時刻，卡達政府並未訴諸軍事對抗，而是展現了令人驚嘆的經濟彈性。這場危機成為 QIA的實戰演練：

1. 迅速注入流動性，穩固國內金融命脈

封鎖爆發後，外資銀行與鄰國資金開始大量從卡達撤資，試圖引發卡達里亞爾貶值與銀行擠兌。卡達政府果斷啟動防禦機制，由 QIA 在幾周內迅速向國內銀行體系注入了高達數百億美元的流動性。這筆雄厚的國家資本瞬間穩定了金融市場的信心，挫敗了對手試圖從內部瓦解卡達經濟的圖謀。

（接續下頁）

投書

2. 將經濟資產轉化為政治影響力

更關鍵的防禦發生在國際外交戰場。在危機爆發前的數十年間，QIA 在西方世界進行了鋪天蓋地的戰略性投資。在英國倫敦，QIA 是倫敦證券交易所、巴克萊銀行、 Sainsbury's 超市的最大股東之一，又擁有碎片大廈和哈洛德百貨等標誌性資產，被戲稱為倫敦地產的隱形主人；在歐洲大陸，QIA 則是德國福斯汽車、瑞士信貸以及多個核心基礎設施的重要投資者。

當斷交危機發生時，這些平日裡看似純粹的商業股份，即可轉化成無形的政治槓桿。沙烏地與阿聯酋原本期望西方盟友（如美、英、法、德）站在其陣營一同譴責或制裁卡達。然而，西方各國在審視自身國家利益時，發現卡達的資本早已與本國的金融、地產、就業和核心企業深度綁定。卡達的倒台或動盪，將直接重創倫敦金融城與歐洲股市。

在此種互賴關係下，西方盟友拒絕加入封鎖陣營，轉而採取中立或是積極協助調停的立場。美國隨後也重申了卡達作為非北約主要盟友（MNNA）的地位，並維持其在卡達烏代德空軍基地的駐軍。最終，卡達在沒有割讓任何主權、沒有改變外交方針的情況下，迫使鄰國於 2021 年全面解除封鎖，取得了這場地緣經濟戰的完全勝利。

<u>中小型國家的生存啟示：創造「不可替代性」</u>

卡達的成功經驗，告訴我們硬實力的不足可以用制度與資本的網絡化來彌補，中小型國家在面對大國的單邊主義或軍事威脅時，如果僅進行軍備競賽，往往會耗盡國家資源且難以彌補絕對體量的差距。若能像卡達一樣，透過國家資本在全球供應鏈、核心金融網絡，就能將自身的存在轉化為全球系統運作的必要條件。

<u>結論：將經濟亮點轉化為安全籌碼</u>

面對當前全球地緣政治風險劇增，中小型國家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卡達的案例證明，小國不能再只是被動地在兩強之間做選邊站，那往往會讓自己淪為大國博弈的犧牲品。

相反地，中小型國家必須採取務實且靈活的思維，精準地將自身的經濟亮點，（不論是卡達的天然氣與主權基金，或是其他國家的半導體、高精尖科技、關鍵礦產與特殊地理位置）轉化為地緣政治的安全籌碼。卡達投資局的全球佈局，向世界展示了金融資產如何轉化為防衛盾牌，這是一部值得所有中小型國家深思與借鏡的生存防禦學。

投書

簡嫚萱-在新冷戰邊緣，中小型國家如何應對？

引言：二元對立下的窒息感

當前的國際局勢，正被日益劇烈的「新冷戰」敘事所籠罩。美中兩大強權在尖端科技、全球經貿體制，以及全球供應鏈網絡等地緣軍事佈局上的全面對峙，正迫使全球各陣營進行一場痛苦且深刻的洗牌。彷彿小國唯一的生存方式，就是盲目地在兩大陣營之間做出選邊站的抉擇，並承擔隨之而來的經濟制裁或地緣風險。

然而，若我們抽離宏大的大國敘事，深入觀察地緣政治的實務發展與歷史經驗，就會發現事實並非如此絕望。諸如新加坡、瑞士、土庫曼以及波斯灣的卡達等中小型國家，並沒有在大國的夾縫中窒息。相反地，它們透過精準的戰略設計，務實的外交操作，放大自身獨特優勢，開創了超乎想像的外交縱深，甚至在特定領域反過來制約了大國的行為。

從消極中立轉向積極的多方外交

中小型國家應對新冷戰的第一個核心策略是推動積極的多方外交。

在過去的國際政治中，部分小國，如冷戰時期的土庫曼或早期的瑞士，追求的是一種不參與任何國際爭端、關起門來發展的永久中立或消極不作為。然而，在當前全球高度互聯、經貿與科技深度交織的時代，當大國之間的衝突延伸至制裁、關稅與供應鏈切割時，消極的中立往往會演變成同時得罪雙方或遭到雙方邊緣化的困境。

現代聰明的中小型國家，選擇不選邊站，但它們在所有陣營之間架設橋樑，透過主動參與國際調停、提供高信任度的制度性平台，創造自身外交上的不可替代性。

卡達的中介者角色：卡達的體量微小，但它長期以來扮演著美國與阿富汗塔利班、美國與伊朗、甚至是以色列與哈瑪斯等極端敵對勢力之間的正式或非正式調停者。在烏俄戰爭爆發後，卡達甚至利用其與莫斯科和基輔同時保持對話的獨特地位，成功協助調停並遣返了被轉移至俄羅斯的烏克蘭兒童。

新加坡的法治與信任平台：新加坡則透過建構高度透明的法治環境與多邊經貿論壇，讓美中雙方的政要、學者與企業家能夠在同一個屋簷下進行理性的溝通與交鋒。

些小國的舉動絕非多管閒事，這是一種極其精明的安全投資。當大國發現，不論爆發何種危機，它們都需要透過某個特定小國來作為傳遞訊息、進行秘密談判或化解僵局的緩衝閥時，這個小國的生存與安全，就獲得了大國共同的隱性承諾。

（接續下頁）

投書

爭奪議題主導權：小國的不對稱作戰

中小型國家應對兩強對峙的第二個策略，是在國際多邊舞台上展開議題主導權的爭奪。這是一種外交上的不對稱作戰。由於資源與體量的限制，中小型國家絕不可能在全面性的地緣政治、軍備競賽或全面經貿規模上與大國進行硬碰硬的競爭。然而，國際政治的議題是多元且碎片化的。小國完全可以在特定的、具有全球迫切性、且大國因彼此猜忌而陷入僵局的關鍵議題上，扮演領頭羊與凝聚共識的角色。

例如，在氣候變遷治理、全球數位主權與人工智慧規範、主權財富基金的綠色投資標準、以及區域多邊自由貿易協定，如 CPTPP、DEPA 數位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的推動上，新加坡、紐西蘭、智利等小國往往展現出比大國更具前瞻性的立法與倡議能力。

透過在這些新興議題上搶先制定規則、凝聚中小型國家的集體共識，小國可以建立起一套多邊的制度防護網。當大國試圖實施單邊主義或強權壓迫時，就能對大國的行為產生道德與制度上的實質制約，從而為小國爭取到更寬廣的政策合規空間與戰略彈性。

擺脫盲目依附，實施務實的網絡化外交

歷史證明，當小國完全依附於某一個大國時，它就失去了所有的談判籌碼，隨時可能在兩強達成某種妥協時被當作利益交換的犧牲品。國家應當學會運用自身在特定產業供應鏈、獨特的地理戰略位置、或是長期建立的外交中介信任度，實施「靈活、務實、去中心化」的外交策略。

小國不需要尋求與大國的平起平坐，而是要將自己變成全球網絡中不可或缺的關鍵節點。只要小國的節點足夠核心，全球化網絡的自我保護機制就會自發性地維護這個節點的完整與安全。

結論：重新定義小國的生存價值

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全球化面臨碎片化風險的新冷戰邊緣，中小型國家的生存學成為了智者的策略賽。卡達、新加坡、瑞士等國的實踐告訴我們，國家的力量不全然取決於國土的方圓或軍隊的員額，更取決於國家戰略的靈活度與對全球互賴網絡的運用能力，透過積極的多方外交、特定議題的領先主導、以及核心經濟產能的戰略化配置，中小型國家依然能夠在兩強對峙的裂解時代中，打破非黑即白的宿命，重新定義自身的生存價值，並在國際舞台上開闢出屬於自己的實質主權空間。

投書

簡嫚萱-烏俄戰爭後，卡達如何重新定義全球能源版圖？

引言：一夜瓦解的舊秩序

2022 年 2 月爆發的烏俄戰爭，是 21 世紀地緣政治的分水嶺。這場衝突在歐洲本土點燃了數十年來未見的戰火，一夜之間瓦解了歐洲過去數十年、甚至自冷戰時期以來所建立的能源地緣政治架構。長期以來，以德國為首的歐洲大國，極度依賴來自俄羅斯源源不絕且價格極其低廉的管線天然氣（如北溪一號、二號計畫），並以此作為推動工業發展與綠色轉型的基石。

然而，當俄羅斯選擇將能源武器化，切斷對歐供氣時，歐洲陷入了嚴重的能源恐慌與通膨危機。在全球尋找替代氣源的焦慮之中，遠在波斯灣的卡達，憑藉其得天獨厚的地理資源與全球頂尖的液化天然氣（LNG）生產及運輸能力，迅速填補了這一缺口，成為歐洲乃至全球爭相拉攏的戰略新核心。

從地理綁定到全球流動：LNG 的戰略解放

要理解卡達如何重新定義全球能源版圖，必須先理解液化天然氣（LNG）與傳統管線天然氣在實體與地緣政治屬性上的根本差異。

傳統的管線天然氣，管線一旦鋪設完成，供氣方與需氣方就陷入了長期的結構性依賴，這種依賴具有高度的排他性，且極易受到沿線地緣政治動盪的挾持（例如烏克蘭過境費糾紛或管線遭到破壞）俄羅斯過去正是利用這種地理綁定，牢牢掐住了歐洲的經濟命脈。

相較之下，LNG 技術則徹底解放了能源的地理束縛，天然氣在經過超低溫（-162°C）液化後，體積縮小為原來的六百分之一，可以裝載於巨型的 LNG 運輸船上，跨越重洋運往全球任何一個擁有接收站的港口。此技術特性使得能源供應具備了高度的流動性與靈活度，轉化為全球市場上可以隨時調配、套利、並具備高度政治彈性的戰略籌碼。而卡達，正是這場變革中的全球最大受益者與主導者。

卡達的多方外交：在需求狂潮中建構利益共同體

當歐洲多國政要，包括當時的德國經濟部長、英國首相等，紛紛排隊前往卡達首都杜哈，迫切尋求短期與長期的天然氣供應承諾時，卡達並未盲目擴張或陷入暴利投機，其展現了極其高超且沉著的能源多方外交手段。

策略維度	卡達的戰略作法與目標
合約機制的堅持	堅守「長期合約（20-25年）」與「目的地限制克勞斯條款」，確保國家數十年穩定的營收回報，並防止炒作。
分散風險的佈局	拒絕將所有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在對歐供氣的同時，維持並擴大與亞洲（中、日、韓、印）的長期合作，實現東西方平衡。
大國利益的交織	邀請美國埃克森美孚、法國道達爾等西方能源巨頭入股擴建計畫，將各國利益與卡達本土安全深度綁定。

投書

卡達非常清楚，歐洲的焦慮是暫時的，隨著歐洲轉向再生能源，天然氣的窗口期可能有限。因此，卡達拒絕了歐洲最初提出的彈性短期現貨合約要求，堅持歐洲必須簽署長達 15 至 25 年的長期購氣協議（SPA）強迫歐洲國家在未來的四分之一世紀裡，將自身的能源安全與波斯灣的穩定綁在一起。

同時，卡達在與德國、法國簽署長期合約的同時，也與中國的國營企業，如中石化、中石油，簽下了歷史性的超長年限供氣合約，又讓中國企業入股其核心的氣田擴建項目。

對卡達而言，與美國密切的軍事合作、與歐洲深度的經濟綁定，以及與中國與亞洲長期穩定的經貿交織，共同構成了一個多方利益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中，任何一方若試圖對卡達採取敵對行動，或者卡達的安全受到威脅，都將引發全球能源與金融連鎖崩潰，這種互賴關係，給予了卡達相當高的外交彈性與安全保障。

<u>北方氣田擴建：掌握全球轉型期的命脈</u>

俄羅斯將能源武器化的最終結果，是徹底失去了歐洲這一最大市場，遭遇了嚴重的戰略反噬；而卡達的能源多方外交，則成功將能源轉化為自身國際話語權的助推器，使其國際地位達到了歷史新高。

卡達重塑全球能源版圖的終極王牌，是正在全速推進的北方氣田擴建計畫，這是全球能源史上規模最大的液化天然氣開發項目，預計到 2020 年代中後期，該計畫將使卡達的 LNG 年產量從原來的 7700 萬噸，大幅提升至 1.2 億噸甚至 1.4 億噸以上。

在全球各國追求淨零碳排，但再生能源尚未能完全跨越間歇性瓶頸的能源轉型期，天然氣被公認為最關鍵的橋樑能源，卡達對北方氣田的絕對掌控，意味著它將在未來三十年內，牢牢掌握全球工業與民生運作的關鍵命脈。

<u>結論：液化天然氣輪船重劃全球權力邊界</u>

當我們在討論現代地緣政治與大國博弈時，我們的視線不應該再僅僅停留於航空母艦的巡弋、飛彈的射程或是軍隊的集結。在波斯灣、大西洋與太平洋上，那一艘艘滿載著液化天然氣、破浪前行的巨型海運輪船，其航線所至之處、合約所鎖定之國，正在悄然且深刻地重新劃定全球權力的地緣邊界，而掌握了這條航線源頭的卡達，已然從一個地緣政治的被動旁觀者，搖身一變成為了多邊世界中不可忽視的隱形巨頭。

投書

簡嫚萱-一條海峽如何牽動世界神經？從荷莫茲海峽看全球秩序

引言：地緣政治的總開關

位於波斯灣入口、介於阿曼與伊朗之間的荷莫茲海峽，無疑是全球地緣政治中最敏感、也最能直接牽動世界經濟神經的戰略狹道。這條最窄處僅約 33 公里的海峽是全球能源供應的頸動脈，當我們審視荷莫茲海峽的風吹草動如何引發全球金融風暴與外交角力時，我們看見的，正是現代全球秩序中權力與互賴最真實的切片。

數據背後的戰略重量：全球能源的頸動脈

要理解荷莫茲海峽為何能擁有如此的戰略威懾力，必須先從其不容忽視的硬性經濟數據談起。

根據美國能源情報署（EIA）與全球航運機構的統計，每日通過荷莫茲海峽的液化石油與天然氣總量，高達 2,000 萬桶左右，這幾乎佔了全球海上石油貿易總量的五分之一，以及全球總石油消費量的 20% 上下。更關鍵的是，亞洲核心經濟體，如日本、韓國、中國與印度，所依賴的進口原油中，有高達 70% 至 80% 必須仰賴這條狹窄的航道安全送達。

這意味著，荷莫茲海峽不是普通的區域性通道，而是全球工業文明與供應鏈運作的底層支柱。地緣政治大師馬漢在其名著《海權對歷史的影響》中曾指出，控制了關鍵海上通道，就等於控制了全球的貿易與財富。在 21 世紀的今天，這條原則非但沒有過時，反而因為全球化對能源的高度依賴，而變得更加具有剛性。

荷莫茲海峽的特殊之處，更在於其地理上的無可替代性。雖然沙烏地阿拉伯與阿聯酋過去數十年來，不斷嘗試興建跨越阿拉伯半島的陸上輸油管線，如沙國的東西超大型管線，試圖將原油直接運往紅海或阿拉伯海港口以繞過海峽，但這些管線的總設計運能，遠遠無法吞吐波斯灣各國龐大的產量。全球經濟在短時間內，依舊無法承受這條海峽遭到任何實質中斷的代價。

邊緣博弈與非對稱威懾：伊朗的終極底牌

荷莫茲海峽之所以長期處於高度緊張狀態，核心原因在於其特殊的政治地理分布。海峽的北岸完全由中東地區的什葉派大國伊朗所掌控，對於長期遭受西方世界極限施壓、經濟制裁與軍事圍堵的伊朗而言，荷莫茲海峽是一張隨时可以用來反制大國的非對稱戰略底牌。

在國際關係中，當弱勢一方無法在常規軍事力量，例如隱形戰機、航母編隊上與超級大國抗衡時，採取不對稱威懾是確保生存的必然選擇。

伊朗並不需要真的派遣正規海軍與美軍在阿拉伯海進行大艦巨砲的對決。相反地，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利用海峽狹窄、水淺、島嶼衆多的地理特性，部署了成千上萬枚廉價的水雷、密集的岸置反艦飛彈、自主研發的自殺式無人機，以及成群結隊、機動性極高的武裝快艇。（接續下頁）

這種狼群戰術與水雷封鎖能力的代價極低，但反制它的成本卻高得驚人。只要伊朗在海峽進行一場軍事演習、扣押一艘西方籍的油輪，甚至官員考慮關閉海峽的口頭威脅，全球的期貨市場就會瞬間做出劇烈反應，國際油價可能在數小時內暴漲 10% 到 20%，進而引發西方國家的通膨危機與股市動盪。對伊朗而言，封鎖海峽的能力，比實際封鎖更具備戰略效益，這讓它在面對強權時，始終保有不被徹底抹殺的談判籌碼。

從油輪大戰到現代灰色地帶衝突

荷莫茲海峽的緊張局勢，最典型的案例莫過於 1980 年代兩伊戰爭期間爆發的油輪大戰。當時，伊拉克與伊朗為了切斷對方的經濟命脈，開始在波斯灣與荷莫茲海峽大規模襲擊中立國家的商船與油輪，造成超過 500 艘船隻受損，全球航運保險費率飆升至天文數字。這場危機迫使美國啟動摯誠行動，派遣海軍為科威特油輪實施武裝護航，甚至引發了美伊海軍之間的直接軍事衝突。

在 21 世紀的灰色地帶衝突中，對抗雙方刻意將行動維持在傳統戰爭的門檻以下，以避免引發全面的軍事報復。例如，在海峽周邊頻繁發生的神秘磁性水雷襲擊油輪事件、商船電子訊號遭到GPS干擾、或是利用代理人武裝進行的無人機襲擊，讓西方國家或跨國航運公司等受害者難以精準指控並發動常規軍事反擊，卻能實質上達到騷擾、施壓與拉高地緣風險溢價的目的。

多邊秩序的試金石：誰來保護全球公海？

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荷莫茲海峽屬於用於國際航行的海峽，各國船舶在此享有過境通行權，這是一項不容剝奪的國際法權利。然而，伊朗雖然簽署了該公約，卻從未正式批准，並堅持自身在領海內享有更嚴格的管轄權。

所以誰該為這條海峽的安全買單？長期以來，美國憑藉其強大的第五艦隊，單方面承擔了維護航行自由與全球能源供應安全的警察角色。然而，隨著美國戰略重心轉向印太地區以圍堵中國，以及美國自身轉化為頁岩油出口國、對中東原油的依賴度大幅下降，華府內部的孤立主義聲音開始質疑：為什麼美國要耗費巨額公帑與士兵生命，去保護一條主要服務於中國、日本、印度的能源航道？而美國戰略後撤也加速了波斯灣的多極化博弈。

中國作為波斯灣原油的最大買家，極度依賴荷莫茲海峽的暢通，但其海外投射能力在短期內仍難以完全替代美國的角色，迫使其必須在伊朗與沙國之間小心翼翼地進行外交斡旋。美、英等國雖嘗試組建國際海上安全架構（IMSC）實施護航，但許多歐亞國家出於不願得罪伊朗或不願捲入大國對抗的考量，紛紛採取觀望或獨立行動的態度。

結論：海峽波濤下的世界未來

荷莫茲海峽的歷史與現狀告訴我們，現代世界的繁榮與穩定，其實建立在一種高度脆弱、動態平衡的地緣結構之上。我們去理解未來的全球秩序時，視線不能只停留在宏大的多邊峰會宣言。那蜿蜒穿過荷莫茲海峽、在無人機與反艦飛彈陰影下謹慎前行的巨型油輪，它們的航線是否安全、規則由誰制定，正悄然且具體地宣告著全球權力天平的傾斜與重組。

投書

朱韻璇—兩個伊朗：從《茉莉人生》看媒體與現實間的矛盾

回頭看 1970 年代西方主流媒體對巴勒維王朝（The Shah）的報導，不難發現當時的輿論充滿了讚美之詞。在《時代雜誌》與《紐約時報》的筆下，巴勒維國王帶領波斯邁向現代化，他帶來了石油財富、世俗的西方文化，以及令鄰國稱羨的經濟增長。但在當時伊朗人民的眼中，這些搖滾樂、迷你裙與女性受教權，卻是建立在剝削、腐敗與祕密警察（SAVAK）的恐懼之上。對當時的人民而言，國王只是西方國家的傀儡。這種表象的繁榮與人民內心不滿所產生的落差，最終引燃了 1979 年的伊斯蘭革命（The Islamic Revolution）。在經典圖文小說《茉莉人生》（Persepolis）中，女主角 Marjane 一家的行動代表著那群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他們走上街頭追求的不是單純的物質生活，而是真正的民主。

然而，革命成功的喜悅很快褪去。此時人民發現，昔日並肩作戰的左派戰友開始逐一消失。書中Marjane最崇拜的 Uncle Anoosh，這位曾為反抗國王而坐牢的馬克思主義者，在革命成功後，竟反而被新成立的伊斯蘭政權指控為間諜並處以死刑。神權體制並未帶來承諾中的自由，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嚴格的限制。強制女性佩戴頭巾、性別隔離教育，甚至演變至今日對女性受教權的剝奪。對 Marjane 一家而言，伊斯蘭共和國所制定的新法律迫使他們將原本的生活樣態隱藏起來，這不僅僅是失去西方文化所帶來的娛樂而已，而是再也沒有了女性自主權、教育與思想自由，最終甚至 Marjane 甚至被迫捨棄了家園。反映出知識階層只能用這種無聲的抗議否定政權的反智及落後。

諷刺的是，在兩伊戰爭期間，伊朗國內媒體不斷鼓吹青年從軍，宣稱戰死後能領取「天堂的鑰匙」，在那裡有取之不盡的富貴與感官享受。時至今日，如 IRNA 等官方媒體，某些報導內容仍能看出維護什葉派政權的利益的目的性，透過短篇、去脈絡化的反美觀點與篩選後的採訪，築起一道資訊圍牆。

回頭看這五十年來伊朗政權的變動，媒體一直擔任不完全可靠的敘事者。1970 年代，西方媒體偏重國王所帶來的西方化，卻忽視其專制的出發點；現今的伊朗官媒則只講宗教的神聖以及如何抵抗外敵，而避談其經濟現況的惡化。媒體呈現出來的樣子，往往基於特定立場或利益，而非反映人民真正的生活。

藉由人民所創作的作品可以得知，真實的樣子往往不在媒體塑造的極端形象裡；更多的是像 Marjane 這樣的人，在戰火與高壓環境下，依然想方設法守護平凡生活。對於一個地理位置遙遠的國家，我們更容易在不全面了解的情況下，便斷定孰是孰非。因此，保持思考是重要的。我們不應被媒體營造的對立視角所操控，唯有如此，才能看清楚飛彈與口水戰背後隱藏的事實。

投書

朱韻璇—WHA敲門十年——從場外活動看台灣的外交韌性

今年的世界衛生大會（WHA）將於18日於瑞士日內瓦召開。健康為基本人權與全球永續發展之根基，醫療衛生不應受到政治干預。然而，至 2026 年第 79 屆大會，台灣已面臨連續 10 年未收到邀請函、被排除在體制之外的困境。儘管如此，台灣在國際醫療公衛領域持續發揮關鍵作用，從前陣子 COVID-19 疫情期間的防疫成績，到今日數位智慧醫療等領域的進展等等。

中國打壓導致台灣無法繼續參與會議

台灣無法參與 WHA 的核心原因，在於中國的政治施壓。中國政府長期在聯合國體系中，蓄意錯誤解釋聯大第 2758 號決議，將其與未獲國際共識的「一個中國原則」掛勾，企圖製造台灣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假象，藉此掩蓋其在台海的軍事挑釁。然而，第 2758 號決議全文隻字未提台灣，亦未授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體系代表台灣。民主台灣與專制中國互不隸屬是客觀事實，只有台灣的民選政府才有權在國際場域代表台灣人民。

能夠堅持在未受邀的情況下出訪，目的第一點不外乎是重塑媒體觀點。透過主動在國際舞台周邊舉辦論壇與展覽，向國際媒體與社會傳遞不應遺漏任何人的訴求，也不被他國簡化過後的報導斷章取義。此舉旨在打破地緣政治造成的資訊封鎖，引導國際輿論正視將台灣排除在外的體制不合理性。另外，在公衛體系展現我國的不可或缺性也是種外交手段。在全球面臨新興傳染病與氣候變遷威脅的當下，全球防疫需要大家攜手合作。這次場外行動，台灣將技術優勢轉化為外交助力，今年首度在日內瓦舉辦「WHA 台灣智慧醫療與健康產業展」，展示台灣在晶片技術、數位醫療與 AI 健康照護的實力，並針對「全球 C 型肝炎消除」與「癌症早期偵測」等實質公衛議題進行技術交流，深化實質的國際合作。 我國亦採取多邊與雙邊外交手段以突破封鎖，透過國際友邦及美國等理念相近國家在各場域為台灣發聲。

綜觀台灣長年爭取參與 WHA 的歷程，媒體報導與地緣政治宣傳往往充滿特定立場的對立。從國際關係的結構來看，台灣在面臨外交高壓的現實下，透過親赴日內瓦採取體制外的實質發聲，其核心本質在於維護國家主權尊嚴，並在威權主義擴張與國際資訊戰的夾縫中，持續守護台灣實質生存與自由的國際空間。

投書

朱韻璇—母語、文化與認同

身為一個修習語言學的學生，庫德語（Kurdish）對我來說，原本只是出現在語料分析作業裡的陌生符號，往往在我們分析完它的音韻規則或語法結構後，就輕易地在記憶中淡出。直到深入閱讀國際新聞，我才驚覺這些躺在課本裡的乾淨文字，其背後竟承載著一個民族沉重的故事。

庫德族人口超過三千萬，是中東第四大民族，卻是世界上最龐大、至今仍沒有自己國家的流浪民族。在二十世紀後半葉，土耳其政府為了建立強大的單一民族國家，曾立法全面禁止在公共場合、媒體與學校教育中使用庫德語。在長達數十年的時間裡，庫德人只要在公開場合說母語、唱民歌，甚至只是給孩子取庫德族的名字，都會面臨嚴厲的法律制裁。國家機器甚至在法律上否定他們的存在，將其貶稱為「山地土耳其人」。雖然到了今年一月，敘利亞政府在經歷政權更迭與軍事衝突後，為了安撫少數民族，頒布法令將庫德語列為國家語言，允許在部分學校選修。但這種臨時政策是否為真正對此民族的重視，仍需要透過時間來檢視。

這種透過打壓母語來進行文化清洗的手段，對台灣人而言並不陌生。回顧台灣歷史，在過去推行「禁說方言」與國語政策的年代，校園裡講台語、客家話或原住民語的孩子，會被罰錢、罰站甚至掛上黑板警告。威權體制深知，消滅一個民族最快的方法，就是讓他們的下一代忘記自己的母語。因為語言不只是發音，它承載著一個共同體的集體記憶、歷史與尊嚴。

語言從來就跟國家權力密不可分。這種由過去政治結構所堆疊出來的語言階級，至今仍潛移默化地影響著社會。許多人在成長過程中，或許都曾有過「講台語是不文明的表現」的心理認知。即便到了今天，這樣的觀念依然存在於部分家庭的下一代教育中。然而，這種對本土語言的輕視，往往忽視了我們今天能夠自由講任何語言的權利，其實是多麼地得來不易。

庫德族的遭遇與台灣過去的歷史都給了我們一個深刻的反思，保護語言的自主權，就是在守護國家的文化主權。

投書

朱韻璇—從南韓選舉爭議反思台灣不在籍投票之立法攻防

南韓日前因選票不足及計票瑕疵引發選舉舞弊嫌疑，震驚亞洲民主社群。南韓為提升投票率，近年積極推動包括事前投票、通訊投票等「不在籍投票」制度；而在開票程序上，南韓採取將選票集中運回特定開票所並由機器判讀的方式，僅限具備許可權者在場，與台灣現行的公開透明原則截然不同。此次事件爆發後，不僅令南韓社會重新檢視其選務制度的正當性，也引發亞洲各國對於多元投票方式可能衍生系統性風險的討論。

回顧台灣的民主化歷程，對於選務舞弊與程序正義的爭取同樣經歷了長時間的抗爭及轉型。1977年桃園縣長選舉期間發生的「中壢事件」，即因選務人員涉嫌協助作票且執法機關處置不力，引發大規模群眾包圍警察局抗議，成為打破威權選務壟斷的轉折點；1992年花蓮立委選舉中，更出現「總投票數大於發出票數」的集體作票弊端，最終透過群眾抗爭與法律追訴，促成台灣歷史上首次因舞弊而驗票後翻盤的判決。

基於這些歷史教訓，台灣在實施總統直選後，確立了「公開亮票、逐票唱票、當場記票」且允許民眾全程錄影拍照的人工投開票機制，以程序透明度換取人民對選舉結果的絕對信任。然而，現行法規強制選民必須返回户籍地投票的限制，長期被批評缺乏便利性。因此，引進「不在籍投票」的呼聲在立法院已爭論近二十年。

目前，台灣唯一開放的特殊情況，僅限於「投票所選務工作人員」與「執勤警察」，允許其依法申請境內「移轉投票」，在當天工作之投開票所就近投票。2026年年初，立法院內政委員會針對《不在籍投票法》立法舉行朝野協商與公聽會，此議題再度成為藍、綠、白三方的戰略攻防焦點。

在野黨主張應全面推動不在籍投票，並將範圍自全國性公投擴大至地方九合一選舉，以保障因求學、工作而背井離鄉的兩百萬選民之參政權。然而，執政黨與台灣經濟民主連合等民間組織則於2026年上半年舉行記者會呼籲「緩議」。反對擴大開放的論點主要基於三層安全結構：

第一，行政癱瘓與錯漏風險：中央選舉委員會與學者指出，以地方九合一選舉為例，全台各選區的選票組合高達近九千種，若全面開放跨區移轉，基層選務在選票運送、名册登載與點交上將面臨巨大的行政負荷，極易產生選務疏失。

第二，制度冒名風險：若採行書面申請而免除本人親自查核身分，可能導致「冒名移轉」的法律漏洞，重演過去變相賄選的操控弊端。

第三，境外介選與信用威脅：民間團體強調，在境外威權勢力高度介入選舉的環境下，引進非實體或脱離現場監督的投票制度，將為資訊戰提供操作空間，境外勢力極易透過炒作「程序不公」來瓦解台灣民眾對民主體制的誠信認同。

綜觀台韓兩國的選務現況與歷史經驗，不難發現民主政治的合法性核心，在於程序必須具備「無懈可擊的可驗證性」。南韓親身證明，一味追求投票率與便利性而採取集中式計票與非實體投票，一旦在流程中出現疏失，其代價將是社會對整體民主體制的信任崩潰。台灣在2026年對於不在籍投票的立法辯論，其本質並非技術落後或保守，而是對於地緣政治威脅與歷史舞弊教訓的理性防禦。在數位操弄與灰色地帶干擾日益嚴重的當代，維持實體投開票所的「肉眼可見、全民監督」，是台灣民主最堅固的護城河。任何選舉制度的改革，都必須在「擴大參政」與「確保選務誠信」之間取得絶對平衡，切莫為了形式上的便利，而鑿開了動搖國家民主根基的程序破口。

小論文

台灣民眾在拜登和川普第二任期對美國協防台灣之民意差異

作者：劉惟瑩、陳品璇、朱韻璇、許懿

研究動機：近年來，美中戰略競爭升溫與台海安全情勢變化，使美國是否會在台海衝突中協防台灣成為台灣社會高度關注的議題。美國長期透過《台灣關係法》、六項保證及軍事合作維持對台安全承諾，然而不同美國總統的外交理念、政策風格與國際局勢判斷，可能影響台灣民眾對美國安全可信度的認知。本研究旨在探討拜登政府與川普第二任期期間，台灣民眾對美國協防台灣態度的變化，並分析造成民意差異的可能因素。

研究方法與目的：本研究以威脅感知理論（Threat Perception Theory）作為主要分析架構，認為民眾對國家安全議題的判斷並非完全建立於客觀軍事實力，而會受到國際事件、美國政策訊號、領導人言論及戰爭成本評估等因素影響。研究方法採取文獻分析與次級資料分析，透過整理美國對台政策發展、拜登政府與川普第二任期的政策差異，以及國內民意調查資料，進行跨時期比較分析。

研究發現：台灣民眾對美國協防台灣的信任並非固定不變，而是在不同國際事件與政策訊號刺激下持續調整。拜登政府時期，美國透過軍售、軍援及高層互動強化對台支持，且拜登本人多次釋出較明確的防衛承諾，使部分民眾提高對美國協防的期待。然而，俄烏戰爭、美國避免直接軍事介入，以及中國對台軍事壓力升高等因素，也使部分民眾開始重新評估美國直接出兵的可能性。相較之下，川普第二任期雖未明確提升對台安全承諾，且強調「美國優先」與盟友責任分攤，但其第一任期累積的對中強硬形象，以及台灣在美國戰略與科技競爭中的重要性，使部分民眾仍認為美國基於自身利益具有介入台海的誘因。

本研究認為，台灣民眾對美國安全承諾的認知，並非單純受到美國總統個人態度影響，而是由領導人政策訊號、國際事件發展、台海威脅程度及美國利益考量等因素共同形塑。研究結果顯示，在戰略模糊持續存在的情況下，台灣社會對美國協防的期待具有高度條件性，並逐漸從價值認同轉向對國際權力結構與國家利益的務實評估。

關鍵字：美國對台政策、台海安全、戰略模糊、威脅感知理論、台灣民意、拜登政府、川普第二任期

小論文大綱

台灣民眾在拜登和川普第二任期對美國協防台灣之民意差異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第二節 研究動機

第三節 研究目的

第四節 研究問題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美國對台安全承諾

第二節 威脅感知理論

第三節 文獻評析

第三章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架構

第二節 研究方法

第三節 研究限制

第四章 拜登政府時期民意分析

第一節 拜登政府對台政策

第二節 民意變化趨勢

第三節 影響因素分析：國際事件、個人風格與威脅感知

第四節 小結

第五章川普第二任期民意分析

第一節 川普第二任期對台政策

第二節 民意變化趨勢

第三節 影響因素分析（國際事件與個人風格）

第四節 小結

第六章拜登與川普第二任期比較分析

第七章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第二節 政策建議

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

小論文

經濟資源是能提升小國外交彈性:
卡達在 2017 年卡達危機後的經驗

作者：朱蕾靜、劉詠婕、江瑜庭、簡嫚萱

在傳統國際關係理論中，小國地緣脆弱、物質資源有限，面對大國或區域強權施壓時，往往只能被動臣服或依附同盟。然而，2017年6月爆發的卡達危機打破了這一傳統認知。

當時沙烏地阿拉伯、阿聯、巴林與埃及對卡達實施全面斷交與陸海空封鎖，並提出要求關閉半島電視台、降級與伊朗關係等涉及主權讓渡的「13項要求」。卡達不僅全盤拒絕，更在2021年《歐拉宣言》中迫使封鎖方在未達成要求的狀況下和解。

卡達之所以能化被動為主動，關鍵在於其擁有高度集中的經濟資源（液化天然氣**LNG**與主權財富基金**QIA**）。本研究聚焦於2017年危機爆發前後的動態演變，探討小國如何將手中的能源與金融資源，轉化為對抗強權脅迫的「外交彈性」。

本研究採用「武器化相互依賴理論」(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來進行分析，根據法雷爾與紐曼所提出的武器化相互依賴理論，全球化網絡的中心節點常被強權政治化，並透過切斷關鍵渠道的「窒息點效應」(chokepoint effect)，以及支配資訊管道的「全景敞視效應」(panopticon effect)實施脅迫。本研究將2017年卡達危機，看作是一場強權利用網路優勢想封鎖卡達，而卡達利用經濟資源進行網路反擊的攻防過程

本研究得出三點核心結論，首先，小國外交彈性的提升，取決於國家能否將關鍵經濟資源進行「制度化、國際化與戰略化」轉化，而非僅擁有單純物質財富。其次，卡達的韌性基礎是由 LNG、QIA 與跨國投資共同構成的，這在危機時提供了關鍵緩衝。最後，當代小國外交的戰略本質並非追求完全獨立，而是在不對稱結構中極大化選擇、降低單一依賴並避免被單一強權控制，實踐「資源支撐下的有限自主」。

關鍵字：卡達、小國外交、卡達危機、武器化相互依賴、主權財富基金、能源外交

小論文大綱

經濟資源是能提升小國外交彈性:卡達在 2017 年卡達危機後的經驗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第三節 重要名詞解釋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文獻探討與理論架構

　第二節案例分析 (卡達的實證研究)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第一節 研究架構

　第二節 研究對象

　第三節 研究工具

　第四節 資料搜集方法及實施程序

　第五節 研究資料分析方法

第四章

　第一節 2017年海灣危機後卡達面臨的外交壓力

　第二節 液化天然氣收入作為外交自主的基礎

　第三節 經濟資源轉化為外交彈性的具體表現

　第四節 經濟資源仍有侷限

第五章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第二節 未來研究方向